

THE NEW AGE OF ASIA

亞 洲 世 紀

第 三 卷 第 六 期

戰後日本人口問題

李秋生

戰後重復抬頭的日本人口論透視

孟憲章

「窮國」日本「人口過剩國」日本

日·野廣原

日本的所謂人口問題

趙南柔

日本人口問題

張白衣

日本人口問題特輯

日本人口膨脹解決的途徑

李毓田

戰後日本人口問題展望

李辛

日本獨占金融資本之復興

亞東協會
研究委員會

裕仁瑣談

卜風

戰後日本的新聞界

本刊資料室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亞 洲 世 紀 社 發 行 所 海 上 路 陽 一 一 七 七 號



亞洲世紀 第三卷 第六期 目錄

三十七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 專論 ★

戰後日本人口問題 李秋生 (一)

戰後重復抬頭的日本人口論透視 孟憲章 (五)

「窮國」日本・「人口過剩國」日本 日・野廣原 (八)

日本的所謂人口問題 趙南柔 (一〇)

日本人口問題 張白衣 (一六)

日本人口膨脹解決的途徑 李統田 (二一)

戰後日本人口問題展望 日・「朝日新聞」載 李辛譯 (二二)

漫畫之頁 (九幅) (二四)

★ 人物 ★

裕仁瑣談 風 (二六)

★ 資料 ★

戰後日本的新聞界 本刊資料室 (二八)

日本獨占金融資本之復興 亞東協會 研究委員會 (三一)

亞洲世紀月刊

出版者 亞東協會 電話 四二三八

主編 徐逸秋

發行所 上海(5) 漢陽路一七七號

東京總經售 日本東京都三區五區

大阪總經售 日本大阪市西區江戶堀下

菲律賓總經售 Lim Bros 238 Solar St. Manila, Philippines.

台灣總經售 林氏兄弟 台北廣州街二五號

南京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南京分社

天津總經售 天津河北三經路吉德里八號

湘鄂桂粵總經售 衡陽濟泰街二號 亞東世紀社湘鄂桂粵發行所

長沙總經售 新中 湖南老照 局

上海代銷處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四號 中國圖書雜誌聯合發行所

定價			郵費		
平	掛	航	費	價	定
每月一册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每月一册
半年六册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半年六册
全年十二册	六元	六元	六元	六元	全年十二册
掛號	四角	二元四角	四角	二元四角	掛號
航空	六角	二元四角	六角	二元四角	航空
平寄	一角	一元二角	一角	一元二角	平寄

◆ 本期售價美金五角 ◆
◆ 國外售價美金二角 ◆



專

論



戰後日本人口問題

李秋生

在各個侵略國家，都有過這樣一套循環性的理論：一方面，爲了解除人口過剩的壓力，必須對外從事擴張；另一方面，爲了進行對外擴張，又必須竭力鼓勵人口的增殖。納粹德國如此，軍國主義的日本也沒有兩樣。這種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拆穿了講，只是爲了進行侵略，而把陳舊的馬爾薩斯學說做爲護符。所不同者，馬氏是悲觀主義者，消極的以遲婚作爲解決人口問題的出路，而侵略者却要用戰爭來取得他們的「生存空間」。

自從各侵略國家相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傾圮，已有許多時聽不到那種要求解決人口過剩問題的呼聲，但在日本，這問題却始終在殘存着。遠自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麥帥總部公衆健康福利部長賴姆羅斯就對記者團發表過關於日本人口問題的見解，提出了以工業品交換食糧，移民海外與生育節制三項意見，這對於一向好修談人口過剩的日本人，實無異於一種鼓勵。在過去，不只日本統治者及其御用學者在高呼人口過剩，就連西方一些著名人口問題學者，如克魯利 (W. R. Croke) 湯姆森 (W. E. Thomson) 也都附和日人的主張，湯氏甚至建議把東印度羣島和新幾內亞讓與日本去殖民。在戰後，日本失掉了朝鮮台灣和太平洋委任統治島各殖民地與聯帶的獨佔市場，在亞洲大陸各地的日本僑民又都被遣送回國，似乎現在來談人口問題，比在戰前更有充分理由。

本年九月間，日內閣統計局發表本年八月一日調查全國人口數字，計共達八千〇二十一萬六千八百九十六人（見本年九月九日日本各報），多年來所預測的「八千萬人口突破」，到現在竟然實現了。於是一般學者作家又紛紛在報章雜誌討論起人口問題，其中比較穩健的，還只是寄希望於增加輸出節約消費及國外援助等等，有些大膽的，便直接提出恢復向海外殖民的要求。如上田文三郎最近在東洋經濟週報所撰日本人口問題論文，即認爲荷屬新幾內亞島是理想的殖民地，主張在十年之內移出二千萬人。這雖然只是一

種個人的見解，但在管制下的戰敗國人民而公然出此，是不能不使觀者們的各盟國相顧失色的。

八千萬人口的疑問

首先，我們對於八千萬人這數字不能無疑。

第一，這數字超過了已往各種預測。據戰後內閣統計研究會的推計，到今年十月一日，日本全國人口應該有七八、三三三、〇〇〇人，要在一九五〇年年底，纔能達到八千萬人（均係中央數值）。更就戰前內閣統計局和各人口問題專家估計，本年人口不過應在七千八百萬左右；更何況在戰爭期間，每年的生殖率都在低減，死亡率則增高；更加大量的戰爭中的死亡——據日方公布已達二百四十幾萬人，則照理現在的人口數字總應該不致比戰前的估計更高。

第二，據日政府所公布今昨兩年的人口，今年是八〇、二一六、八九六人，比較去年的七八、六二七、〇〇〇人增加一、五八八、八九六人。據盟軍總部公衆健康福利局健康統計課長菲利浦斯八月廿一日發表的談話（見廿二日朝日新聞），指出去年一年日本的生殖率爲昭和元年（一九二六）以來最高額，死亡率爲明治五年（一八七二）以來最低額，其自然增加數字爲一、五六二、五八七人，與上述的增加數字相差不遠，折合自然增加率在千分之二十左右，雖嫌稍高，却也是一個國家在戰爭甫經停止後的通常現象。所成問題的却是去年的人口數字比較前年（一九四六）的七三、一一四、一三六人，相去太遠，竟增加達五百五十餘萬人之巨。唯一可能的解釋只是其中包括有由海外遣送回國的大量日僑，但我却懷疑在那同一期間，未必竟有四百餘萬之衆。

因此，即使我們姑且以這八千萬的人口做爲討論的根據，對這數字，却

不能不做相當的保留。

日本人口發展趨勢

世界有三大人口密集區，亞洲東南部分(包括我國東南沿海與越南)與日本是其中之一，但日本却一向特別以人口稠密著稱。當明治維新之初，其全國人口總數是三四、八〇六、〇〇〇人(明治五年)，到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已增殖到六九、二五四、一四八人，六十七年間恰好增加了一倍。這時期日本從落後的島國成爲工商業高度發展的國家，其人口隨而增殖，本屬當然，其進度也與整個世界人口的平均增加率不相上下。更就日本人口的自增加率而論，在一九二五——三〇年之間每年平均每千人爲一四二，也與同時期內全世界的自然增加率相差不多，而低於蘇聯(千分之三三九)保加利亞(一七八)埃及(一七四)南非(一七一)與菲律賓(一五九)。照這樣的增加率本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更何況日本的人口增殖速不出一般工業國家的通例，自從一九二六以降，已有逐年漸減的趨勢。所以上田貞次郎在一九三三年發表關於人口前途的預測，認爲到一九六〇——七〇年即將到達增殖頂點，而彼時的總人口也未必能超過八千萬人以上。到九一八事變以後，日閱銳意實行侵略，竭力獎勵人口的增加，一時出生率頗見上昇。到大戰爆發，由於戰爭和空襲，人口的增加復見銳減，這我們可以從太平洋大戰前後日本人口統計數字的比較明顯看出來：

一九四〇年	七三、一一四、三〇八人
一九四六年	七三、一一四、一三六人

六年之間不但不曾增加，抑且略有減少。

湯姆遜氏曾把各國人口分爲三類，第一類是厲行生育節制的國家，其自增加率正在減低，如西歐各國；第二類死亡率減退甚速，出生率亦開始由人力加以控制，如東南歐各國；第三類國家則出生率與死亡率純任自然，其人口的增加自然也是純任自然，日本與中國蘇聯印度同屬於此種國家。若干年來，日本的出生率與死亡率一向都佔很高的數字，試以與日本自然生殖率相近的幾個國家相比較：

國別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加率(每千人中)
日本	三四九	二〇三	一四七(一九二六)
荷蘭	二三八	九八	一四〇(一九二六)

身拉圭	二四五	一一七	一三八(一九二五)
墨西哥	二二二	八八	一三四(一九二六)

日本的情形是何等的浪費？

在去年，日本出生率爲三四五·二七，死亡率是一四六·五四，自然增加率爲一九八·七三。其出生率之高，前面已經說過是戰後一般的現象，無足驚異，等此後日本國家和社會都恢復正常態勢，絕不會總停留在這樣高的出生率。至於去年死亡率的較低，却有些出於意外，有人解釋爲由於衛生狀況的增進，與B.G.O、D.D.T的普遍應用等等，事實上恐怕未必盡然。但即以一九四六·五四這數字而論，在現代文明國家當中仍舊是少見的。

就一般通例而論，隨着經濟發達與文明進步，必然要伴隨着人口出生率與死亡率同時下降，此外更由於遲婚，實行生育節制，人口由鄉村向城市集中等等，其進一步的結果則爲出生率的減退比死亡率更加快速。現在的日本正由上述第三類國家進入第二類國家，如果日本的社會文化繼續在向上發展，而不再開倒車，則在不久的將來可望其亦將步西歐各國後塵。根據戰前日本人口增殖的趨勢來推測未來的發展是不正確的，如果只以戰後一二年間的特殊人口現象作爲根據更屬一無是處。

日本人口的組成

現在再進而研究日本人口的組成。從年齡的分配中，首先可以看出日本人口中的勞動無能力者羣，要佔最大的比數。

在許多西歐國家，人民平均壽命長，兒童夭折率低，所以在其年齡組別中，壯年者所佔比數最大，老人亦相當多，幼兒則較少。日本恰恰與此相反：

英格蘭與威爾士	五歲以下	五歲至十五歲	十五歲至廿五歲	廿五歲至四十五歲	四十五歲以上
美國	八八	一八九	一七六	二九三	二五四
日本(以上均一九三〇年)	一一〇	二〇九	一七六	二九三	二〇八
日本(一九四六年)	一一二	二二二	一七九	二六一	二〇九
日本(一九四六年)	一一四	二三四	一九九	二四四	二〇三

(以上均係每千人中之比例)

在英國和美國，近廿餘年間的民平均壽命又見增長，出生率則稍見減少，因此我們雖然缺少英美近年來的統計數字，但可想像其幼兒所佔比例當更減低，壯年和老年則見增高。至於日本，經過了二十六年，人民壽命與兒童夭亡都缺少改善，壯年者羣却反而減少了。這自然是曠武作戰的結果，同時也可見照這樣年齡組別的人口，在生產的觀點看來是非常不經濟的，因為純粹無力生產者所佔比數太大了。

再從男女組別方面看，歐洲各國一向是女多於男，美國則為男多於女，日本戰前兩性的比例本來相當平衡，男子略多一點，到戰後却一變而為女多於男：

國 家	男 子	女 子
歐洲 (一八八〇)	九四·二——九九·五	一〇〇
(一九二〇)	九〇·七——九七·三	一〇〇
美國 (一八八〇)	一〇三·五	一〇〇
(一九二〇)	一〇四·〇	一〇〇
日本 (一九二〇)	一〇二·一	一〇〇
(一九三〇)	一〇一·〇	一〇〇
(一九四〇)	一〇〇·四	一〇〇
(一九四六)	九一·〇	一〇〇
(一九四七)	九五·〇	一〇〇
(一九四八)	九六·〇	一〇〇

這自然又是曠武的結果。老弱多，婦女多，壯男少，這在生產的觀點上看來又是不利的。

更就都市人口和鄉村人口的比例分配着，在太平洋大戰的前夜，正是日本人口向都市集中的最高峯，到戰後，却差不多恢復到九一八事變前的比例：

年 份	都市人口百分比	鄉村人口百分比
一九三〇	二四	七六
一九三五	三三·七	六六·三
一九四〇	三七·七	六二·七
一九四六	二九·七	七〇·三

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工業化的象徵，戰後日本人口之由城市向鄉村疏散，正說明工業的衰落，自然盟軍對於各大城市的轟炸也有相當影響。我們固然不

希望日本工業過份膨脹，但如由產業衰落而產生了失業和貧困，却也是中國之累。

人 口 密 度

現在我們進而研究日本的人口密度。不可否認的，日本人口密度相當高，如果根據今昨兩日政府所發表的人口數字，則每方公里的人口當已超過二百人：

年 份	日本 (每方公里的人口)
一九三五年	一八二·二
一九四〇年	一九二·三
一九四六年	一九二·三
一九四七年	二〇六·八
一九四八年	二一〇·〇

戰後有大批日軍日僑從海外遣回，所以即使我們對於八千萬的數字不能完全置信，但也不難想像戰後日本人口密度的激增。不過，這樣的人口密度並不算世界最高的。

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各國 (每方公里人數)

巴貝多斯 (西印度群島中之爪哇)	三二六	二六八	二五四	一九五
英國屬島 (爪哇)	四四四	三二六	二六八	二五四
比利時	二六八	二六八	二五四	一九五
荷蘭	二六八	二六八	二五四	一九五
英國本土	二六八	二六八	二五四	一九五

這些國家的人口密度都比日本高，巴貝多斯甚至要高到一倍，却都沒像日本這樣，把人口問題看得如何嚴重。這各個地區中又可分為兩個類型：巴貝多斯與爪哇都位於熱帶，盛產蔗糖，人民生活水準雖低，謀生並不十分困難；英比兩國都是工業發展到最高的國家，荷蘭工業和牧畜業也很發達，所以儘管人民生活水準遠高於日本，却從未感到人口的壓力。日本在天賦上自然不能比巴貝多斯與爪哇，工業化的程度也遠不如英比，但也不難學步荷蘭的榜樣。

日本的人口密度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全國各地極不均匀，差別甚大，試舉幾個地方的人口密度為例：

一九四六年人口密度 (每方公里)

東京府	一、九五一、〇
大阪府	一、六四一、五
神奈川縣	八五八、八
福岡縣	五八八、五
愛知縣	五七四、五
岩手縣	七九、八
北海道	三九、二

可見舉凡重要工商業城市附近地帶(神奈川、愛知、福岡三縣分別為橫濱、名古屋、與門司、小倉、八幡、福岡各大城市所在地)，人口都特別密集，而北部氣候寒冷的北海道岩手等地，則居民異常寥落。但像北海道這種地方，却絕非荒寒貧瘠，而是日本尚待充分開發的富源所在地，在大戰末期，日本海上交通受阻，海外各佔領地都岌岌可危，若干日人便高呼要積極開發建設北海道，可見前此只是一味銳意對外擴張，對於國內尚待開發的地方竟是棄置不顧。北海道面積並不算小，約佔全國四分之一弱，人口却只有全國的百分之四。八。當地還有大量的可耕土地有待於墾殖，特別適於新式的大農耕作。此外關於畜牧林業礦產漁業以至鋼鐵製紙水產火柴等工業，都有充分發展的可能。位置雖然偏北，却與美國的新英格蘭地區同在北緯四十二度——四十五度左右，其所受北極寒流的影響亦相彷彿。我覺得日本如果真是人口過剩的話，不必一味唾棄新幾內亞，倒應該首先考慮地曠人稀資源豐富的北海道。

在大戰末期的盟軍轟炸與工業萎縮中間，各大都市的人口都普遍減少了。日本六大城市戰後人口的減少

東京市	一九四〇年	一九四六年
大阪市	六、七七八、八〇四	三、四四二、一〇六
名古屋市	三、二五二、三四〇	一、二九三、五〇一
京都府	一、三二八、〇八四	七一九、三八二
神戶市	一、〇八九、七二六	九一四、六五五
橫濱市	九六八、〇九一	七〇六、五五七
神戶市	九六七、二三四	四四三、八四四

像東京大阪神戶都減少了一半上下，其餘三大都市與其他各工商業都市也都一般的減少了。這自然是一種無可如何的趨勢，但是另一方面，也恰好說明了各都市今後還有容納更多人口的能力，日本人民，一時還無須乎憂慮「無

立錐之地」。

食糧與就業

綜上所說，單就日本人口本身當前情勢與其發展趨勢看來，並非如何嚴重。一些「人口問題專家」如上田文三郎之流大可不必危言聳聽，以致影響盟邦人民的觀感。不過，吾談到日本人口問題，則還有一些意見需要說明。所謂人口問題，本來有兩方面的意義，一為食糧問題，一為就業問題，在日本一向是前者最引起重視。

今年恰是馬爾薩斯發表其人口原理的一百五十週年，雖然他在古典經濟學家中依舊有他的地位，其人口理論却早被事實所推翻，他並不知道人口發展的趨勢從來沒有按着幾何級數增加，他也未料到十九世紀運輸業與農業的進步。却想不到今天還有人援引他的理論去證明日本食糧不能自給，需要向外移民。今日世界各國中，僅有本國食糧不能自給却並不因而引起社會不安的國家，不過照日本的情形，却連食糧不能自給這句話也還多少有些疑義。

日本國土雖小，可耕面積也不算大(約佔全面積百分之十九)，糧食的生產却有極好的成績。南迄九州，北達北海道，幾乎無處不是稻田，在亞洲各國中，米的產量雖少於中國印度，却比較安南暹羅緬甸爪哇各地都要超出一倍。今年的產量，據各家預測約可達六千二百萬石。如果照明治中葉每人每年消費米七、八四斗計算，則即使我們承認八千萬的人口，也已可恰恰够用。現在日本人民的每日配米量是每日二合五勺，據美陸軍部八月三十日宣佈，自十一月一日起將增至每人每日二合七勺，則每年需米九斗八升五合五勺，按八千萬人口計算，所需七千八百八十四萬石，產量不敷之數不過一千六百萬石。而日本前年度大小麥粟等產量已在二千萬石以上，此外還有甘薯馬鈴薯玉蜀黍等都可以當作主食使用，其真正不足之量已很有限。何況日本正以大量輕工業製品向中南半島和南洋一帶輸出，由國外購入米糧並非難事。更何況日本的米糧產量迄今並未達到最高飽和點。

在明治末年，每年日本米產量的增加量很可驚的，但自第一次歐戰停止後，增加率已見減低，這並非土地開闢漸減原則的實現，而是日本農業生產力已經受到不合理的生產關係桎梏——農民中過半數的佃農每年要負擔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地租，他們那裏還有餘力去購置農業機器，改良耕種技術，甚至連日本土地所最缺乏的鉑素肥料都買不起。而且勞動力的低廉也根本妨礙了

農耕的機械化。土地分割又極細碎，有百分之七十農戶的耕田還不到一町步（合一六·一四二華畝），這是一種極不經濟的農作經營。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數年，殖民地米產發達，於是政府對於耕地擴張和農產增產都不積極從事，米糧產量的增加亦即停滯不進。到戰後，雖有過兩次的農地改革法案，其成效却極微小，迄未能打破農村生產關係中的封建桎梏，這是妨礙日本米糧增產的主要原因。現在日本本土還有百分之四（約佔可耕土地四分之一）的可耕土地尚未開闢。對於此等因素一概視若無睹，而只一味高呼食糧不足，完全是自欺欺人。

即使今後若干年間日本人口還在繼續增產，其所需要的食糧也儘可從日本本土獲得解決。

另一方面，戰後日本人民素質的低下是衆所公認的，這除却現行「國民優生法」而外，更應該厲行生育節制，合理的控制人口的增產。

至於有關就業問題的人口問題，則牽涉着日本戰後的整個社會經濟機構

戰後重復抬頭的日本人口論透視

孟憲章

（一）人口論本是帝國主義對外侵略的武器

資產階級最寶貴的辯護士，僧侶經濟學者馬爾薩斯，曾發明了一個「人口按幾何級數增加，食料按算術級數增加」的似是而非的謬論。根據他的理論，在這種可怕的「慘局」之前，救濟之道，只有三條道路：（1）禁慾，（2）罪惡，（3）天災人禍。馬氏認爲有決定作用的障礙的，只有屬於第三條的戰爭、疾疫、貧困、和水旱天災。

馬氏的人口論，以後就成爲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武器。百萬富翁，英波戰爭的罪魁，羅得斯說：「爲使聯合各國四千萬人免除殘酷內戰的危險，我們殖民主義的政治家，應該佔領新的領土，以求安插過剩的人口」。希特勒的國社黨綱第三條也說：「我們要求土地和領土（殖民地）來給養我們的國民，安插我們過剩的人口」。戰前日閣也曾藉口人稠地狹，妄指我東北及南洋爲日本生命線，要求佔領或殖民，以便達到先征服滿蒙，次征服全中國，最後征服全世界，實現其「八紘一宇」的狂妄夢想。

。此次戰敗之後，本是實施經濟民主化的黃金機會，但由於內外種種原因，像解散財閥農地改革等都成爲有名無實，因此完全就業的目標亦復可望而不可即。由於工礦業與商業貿易在戰時的崩潰，以致都市人口成爲過剩而大量走向農村，過去兼營農村副業的農家都不能不儘以農耕爲專業。數百萬國外兵士與僑民的被遣回國，又增加了就業的困難，同時又產生了大量失業者與流浪者，而國民所得則普遍的減低。到日本社會經濟與對外貿易漸次正常化之後，這問題可能稍獲好轉，但却決不可能徹底解決。更何況在日本人口的年齡組別中，已充分說明了直到現在，仍舊是無力生產者佔最大的比重，這也是不利於完全就業的。

我的結論是：日本現在的一些人口預備都失之誇大，而對於本國食糧供給及其可能的發展都估計過低，因此我認爲今日的日本還說不到人口過剩，食糧問題也不嚴重，所難予圓滿解決的倒是就業問題。

（二）人口論又成爲日本侵略者要求擴張的工具了

日本無條件投降以後，在過去七十多年來其帝國主義者對內麻醉國民，對外實施侵略的主要藉口——人稠地狹的人口論，原已消沉一時。隨着美國管制政策的寬大，年來復有抬頭之趨勢。去夏當片山內閣時，蘆田均担任外相，即有移民台灣優先權之主張。本年五月二十三日東京聯合社報道：「日本天主教新聞今日宣布：日本各主教已設立秘書處，研究開闢日本移民之路，以和緩日本人口過剩之壓迫。教會方面認爲與世界天主教領袖接觸，或可得彼等幫助發現一大批工業、農業與殖民地計劃，歡迎日本之勞工與技師。尤其注意非洲殖民地與人口稀少之拉丁美洲各國。」天皇對於所謂人口過剩，亦有深表關切之談話。而新亞社亦報道：

近年來，日本各界所製造擬以要求美國提高工業水準之人口問題，又自各種角度發表歪曲之理論，如美濃口時次郎及寺尾琢磨均曾發表要求廢止舊

人口政策，主張以發展工業為解決人口問題之鑰。至於斯揣克報告書中「日本人口至一九五三年達八千五百八十萬人」之說，恐亦係以日本工業家大河內一男去年在大阪某次演講中所宣傳之數字為根據。大河內氏在該演說中即曾說明：「屆時為維持日本人肉體最低限度的必要費用，以一九四一年日元幣值計，最少必需三千億日元，除十億元可由國內產原料製造輸出而獲得外，其餘二十億元，縱令由加工於輸入原料上可以獲得，現有之工業設備亦應增加。至於其餘十億元，則必需將舊有軍需產業設備轉變為輸出工業設備後，始可有濟。」

最近十一月份日本著名之「東洋經濟週報」刊載上田文三郎論文一篇，竟公開要求應以新殖民地給予日本，以解決日本人口問題。文中並提出十年移民計畫。據推計十年後移出二千萬人，日本國內人口可減為六千五百萬人，便可達到糧食自給之境。上田亦提到十年後人口仍將累增，糧食自又發生恐慌，屆時是否又需要新殖民地。該文內稱：「日本目前尚在佔領之下，提倡移民，自不無為時尚早之感，但此事對日本之存亡關係重大，非及時考慮對策不可，日本一向就遭遇到糧食恐慌的難題，戰後又突然喪失了鮮、台等糧食供給地，同時海外移民又大量返回國內。當前過剩人口對策，除海外移民外，就無其他途徑。海外移民究竟應向何處移？以何種方法移？第一必須對手續承諾，不能再行自由移民。著者認為荷屬新畿內亞島最合理想。」上田在敘述移民四大要件之後說：「在日本固有國土狹小，糧食生產有限，天然資源貧乏，工業品輸出受限制，人口高度累增等條件之下，謀將過剩人口向海外移住，乃救國之急圖。當然這件事還是要經過麥帥核准及徵得該地地主權國的同意，假如對方可以同意，日本政府即須立即擬定計畫，並提請議會通過預算。這也必須相當之時間。如果要等聯合國簽訂和約以後再進行，便緩不濟急了。政府應迅速經過關係方面向對方交涉，請其同意移民，此事非僅可以解決糧食問題，並且也可以解決目前失業問題及其他社會與經濟等諸項問題。」

(三) 從戰前統計證明日本根本並無人口過剩問題

人口論的理論根據，既甚脆弱，而且依據戰前統計數字，日本又根本無人口過剩問題之存在，因為：

1. 就人口密度說：戰前日本人口的平均密度據波撲夫著日本經濟論，為每平方公里一三七人，本土為一六八人，在地質最肥沃之北海道，面積之廣佔其全國面積之二五%，但人口僅佔全國人口約二%，一平方公里約為三二人，在南庫頁島僅為二五人但比利時為二六五人，荷蘭二四四人，英本國一九七人。又據一九三九年日本國勢調查，各國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比利士二八〇人，荷蘭二六四人，英國本土一九五人，日本只一九〇人。至我國沿海各省及印度若干地區，且有更高之密度。

2. 就耕地說：戰前日本耕地僅佔全土地面積一七一·一九%，但在意大利則佔四三%，法國四二%，奧國三七%，英國二五%。

3. 就人口自然增加率說：日本人口的自然增加，即對於死亡率之產生率之超過，從較長期間的動態證明，大約一年平均對於一〇〇〇人為十四人。這比蘇聯的二三·八人就少得多，比加拿大的一四一·一五人也低。日本的產生率，在戰前近二十年間，不但沒增加，且表現着低下傾向。而死亡率則止於非常高的水準。在一九二〇年且達到二五·四人。其死亡率之大，並不較中國小，而超過英、美、法約兩倍。

4. 就移民說：日開狂叫殖民移民數十年，且曾予殖民移民以甚多特權，然收效却極微。在其舊殖民地中，如在台灣，其殖民僅約佔其全體居民二·五%，在朝鮮約二%強。至在我東北，雖在旅大租借地內，日本佔全居民數幾達一〇%，但以東三省全體言，不到一%，即日開獎勵移民東北三十年，除旅大九萬六千人外，所移者僅十萬三千人。而其駐軍，最多時竟達一二〇萬人。至於中國本部，則日本人僅止五萬二千人，且大都住在都會內，其中二萬六千住上海，一萬三千住在漢口。且在中國移民，除東北尚有一部業農外，餘全為商人、軍人、浪人等。又根據統計，日本移民歸國率非常高。如一九二〇年，移出一三〇〇〇，歸國一五〇〇〇，一九二八年，移出二〇〇〇〇，歸國一五〇〇〇。據一九二八年十月調查，日本全部移民為七一八〇〇〇人，與擁有近千萬移民的中國比較，固遠為遜色，即與英義等國比，也是小巫之見大巫。（參考P. P. 著趙南柔譯「日本經濟論」二十六年商務版）

(四) 解決日本糧食不足的有效辦法

日本根本並無人口過剩問題，其經濟問題之真正癥結，實在(1)其半

封建的土地制度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實物地租，過度剝削農民使農民無力亦無興趣改良耕種。(2)農耕規模的特別細碎，致無法實施集體化與機械化。

(8)基於封建關係採取的地主，甯願投資於利得較多的企業，而不投資農業。因之，其農業生產遂逐年衰落，與其飛躍發展的工業，恰成一尖銳對照，而有食糧不足之現象。故解決食糧問題之有效辦法，端在實施農地改革，並開墾肥沃荒曠之北海道。(據新亞社調查：日北海道面積八八、七七五公畝，佔全國面積(戰後面積)百分之二十三，人口(昭和十三年調查)僅三、二二六、四〇〇人，在戰後人口比例，亦不過佔全國百分之四、七，而在富源方面，煤炭埋藏量佔全國百分之四十九，馬鈴薯收穫量佔四十一，漁獲量佔三十九，森林蓄量佔三十二，其他可開發之資源亦甚豐富。

當我國堅持抗戰，使日軍深陷泥淖後，日閣為支持長期侵略戰，將全國勞力資本都集中到軍需產業方面，許多農耕地都變成工廠與飛機場，因戰爭而發生之糧食浪費亦大大增加。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已呈對外食米依存的嚴重現象。一九三九年日本由南洋輸入米十五萬石，一九四〇年便突增為七九八萬石，一九四一年更加到九八二萬石。以十五萬石與九百餘萬石比，其嚴重可見。及太平洋戰爭進入盟軍反攻階段後，日本完全失掉了自南洋一帶補給糧食的可能性，日閣除盡量掠奪農民減少一般人糧食分配量外，便計劃增加糧食生產，以謀自給自足。據一九四四年農相山崎達之輔，在議會報告：「第二次增產計劃的數量，一九四四年度為二百萬石，(包括朝鮮、台灣等地)一九四五年度約四百萬石，一九四六年度約三百一十萬石，累計起來，到一九四六年度可以比從前增產約九百萬石，到那時糧食問題便可解決。」因有軍閥支持，所以第二次增產計劃實行的結果，收到了百分之百零四的好成績，第三次計劃實行的時候，雖在盟軍的猛烈空襲之下，仍然有百分之八十八的成績。

日本投降後，日政府一時頗感惶惑，以為其具有軍事潛力之工業武裝，必將徹底解除，於是決心從糧食自給入手。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九日的緊急閣議中，成立了「緊急開拓事業要綱」，其中包括開墾荒地一百六十五萬町步，改良耕地二百一十萬町步，依計劃進行，到一九五〇年可以增加白米二千一百二十萬石的收穫，其增產的方法，包括墾荒，填水造田，及改良耕地三種，到五年之後，計可增加一百萬戶農民，非僅由國外遺歸的日僑可以完全收納，即是軍需工業廢除後，剩餘的人口，亦可容受。這一計劃仍是承襲

着戰時增產計劃而來的，所以也叫作「第四次增產計劃」。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盟總又批准公佈農地改革法案。這個法案固不徹底，然若與上述開拓計劃，一併認真實施，根據專家估計，日本農民改革後，加以實行農耕機械化，日本糧食生產，可望增加兩三倍，日閣過去用作侵略藉口的「人口過剩」「糧食不足」等口號，均將不成其為理由，又何需美國年運數百萬石食糧救濟？

(五) 戰後重現人口論虛玄的真正目的

隨着美國要把日本重建為遠東工廠，並恢復其戰前國外貿易，日政府遂不願再將國幣花費在開墾和填水造田上面，於是第四次增產計劃之成績，遂遠不如從前。因為在前項計劃中，大部分的荒地是規定了以「集體人植」辦法實施的，這樣的制度如果實行起來，對於地主，對於資本主義經營型態，是含有破壞的。故地主資本家多表示反對。而農地改革之結果，又是有名無實。於是日向復興大道邁進的日本，所走的仍是戰前偏重工業與對外貿易之侵略的覆轍。據新亞社東京電：某日本民主經濟學家表示，日本之經濟問題即目前所宣傳為解決日本人民生活的問題，並非如一般所稱「非發展對外貿易，即不能維持日本人民生活」之嚴重，多數企業家仍均憧憬過去侵略國外市場之繁榮景象，故均不願付出較多之努力，以謀國內之開發。某氏更指出去年五月間經濟權威雜誌，「金鋼鑽」即曾作開發北海道之呼籲，備目前復興計畫置重點於此，想不致招來各方之疑慮與阻撓。氏最後慨嘆時日之過去，形勢之變遷，足以解決目前日本經濟問題之開發北海道之議已遭遺忘與鄙視。

果然，五月十七日即發表之日本經濟復興五年計劃第一次試案，對於日本人口，即有計劃的作了如下的估計：

一九三〇—三四年(基準年)平均人口	六六、三三〇、〇〇〇
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	七九、九九〇、〇〇〇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八〇、八九五、〇〇〇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	八一、六一八、〇〇〇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	八二、二九一、〇〇〇
一九五二年十月一日	八二、九三二、〇〇〇

據云，僅五年計劃完成時，日本人口將較基準年度增加百分之二五，若消費

與投資比例不變，則實質國民所得，必須達到基準年度的一二五%，雖使在一九五二年獲得一九三〇—三四年的同等生活水準。可是，這個試案的重心，對於一九五二年農林水產等指數，僅為基準年之一〇五，而工業則為一三〇，至為重工業核心之煤炭與鋼塊則均特提高至一四一，進口為一、六四六萬萬元，出口為一、六五七萬萬元。由此可知，他誇大人口論之目的，僅不過為了重建日本為遠東工廠。

最近日本厚生省發表一九五二年人口之新估計為八千九百萬，前後相差竟達六百萬人，約為百分之七強。因之九月十日，復將原草案修改：(A)工礦生產，由原方案之百分之三〇提高至百分之四一。(B)農業生產，由原方案之百分之二〇五，提高至百分之二一〇。(C)輸出增為一、八五〇百萬美元。如此故弄虛玄，顯欲藉此掩人耳目，以期博取美援，增加生產設備，減輕賠償，實遠超過足以維持基準年生活水準之需要，用以加速其復興之過程。

(六) 盟總難辭縱容之責

最近東京回國談話，五年復興計劃中之誇大的人口數字，據云係美官方授意，確否固不敢斷言。但據五月十日「朝日新聞」載盟總天然資源組在同月九日發表的報告中說：「一九五〇年日本人口將達九千二百萬，即使現在的耕地擴張計劃能順利進行，收穫量能增加，畢竟還有四分之一的食糧不能自給，日本必須重新實行一九二〇或一九三〇年代的政策，這政策便是把日本的資源集中於消費財生產的擴大，充分確立輸出貿易，以獲取原料資材及食糧的輸入。」這等於承認日本七十年來所聲稱的人口問題是有根據的，同

「窮國」日本·人口過剩國「日本」

日·野原廣

在以九一八開始的全部侵略戰爭期內，日本為了證明這戰爭的「正當性」而已準備好的口號，是「窮國」、「人口過剩國」。這種口號，不用說是把馬爾薩斯之流的論理——即視人口過剩為「無理地企圖繁殖的動物似的慾望，與不能滿足此種慾望的自然的貧乏性之間的矛盾的結果。」——更向

時也等於承認日本再度實行經濟侵略是合理的，這不能不說是與被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各國人民，尤其是受害最深的中國人民的期待相背的言論。今竟出諸代表盟國管制日本盟總之正式報告，殊屬遺憾。查日本在投降前一年即一九四四年二月的調查，人口為七二四七三千人，在投降翌年即一九四六年四月的調查，為七三一一萬人，可是當時已有二二萬從各國遣歸日人，所以在二年餘期間內，不但沒有增加，反有減少現象。其後在一九四七年十月的調查，為七八九二七千人，可是在同年六月為止已有五四九九千人從國外遣歸，所以實際上比一九四四年二月，在三年半以上的期間內，只增了三十一萬餘人。那末，為什麼從一九四七年十月到一九五〇年這短短二年餘的期間內就會增加，所以盟總對於日本誇大之人口論，縱非授意，亦難逃縱容之嫌。

上田擬將日本人口移出二千萬，縱有此大批過剩人口，又將向何處移入乎？據五月三十一日法新社坎伯拉電：「澳洲政府發言人稱：澳洲將用一切方式反對日本在太平洋移民。發言人所以有此聲明，因東京盟軍總部盛傳美國當局正在考慮將過剩的日本人口送往太平洋各島。澳發言人力言澳洲決不附議是項計劃，因即使僅允許一個日本人移殖，太平洋各島不久也將遍地皆是。」在日本政治經濟未真正民主化以前，即有真正之人口過剩問題，除非視日本為潛在友邦地廣人稀之美國，可能改變排斥有色人種移民政策，歡迎日人移入率先倡導外，遠東各國，想沒有不和澳洲同感的。何況又是完全作為幌子的人口論，又是完全落入了陳腐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窠臼，既對在農業改進上的科學的威力忽視，復對阻止日本農業發展地因素漠然的無視現實的架空之論？

上飛躍一步，而欲從外面去尋求此種「矛盾」的解決而已。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永遠不變作為前提的馬爾薩斯的人口法則，其當然的結果，倡言「貧窮不是社會的原因的產物，而是自然的原因的產物」，強調着人口的絕對過剩的可能性，這是世所週知的事。在他，認為自然的條件是絕對的，而過剩人口在地面上是不必要的多餘者。但是在正確地認識着歷史發展的人，

則覺得人類的生活是站在自然與技術的相互關係上展開的，關於這點，他們認為絕無可疑的餘地。換言之，人類以自己的技術去對一定的自然發生作用，使自然發生變化，而謀生活資料的擴大。這樣，物質的生產力的大小，決定生活資料的大小，而最後則決定人類的數量的增減。並且這種物質的生產力，一方面固造成一定的社會形態，同時在另一方面又受這社會形態的制限。『在實際上，所有一切的特有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有的，適合歷史的人口法則。』抽象的人口法則決不存在。因此，絕對的過剩人口也決不存在。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產生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初期，憑牠的庸俗性而獲得了很多的信奉者。但是在資本主義上升期，則這種溢出經濟學的領域之外的算骨的「法則」，即使在資本家，也實際上並不認為牠有值得一顧的必要；在他們，毋寧是在下面的一點上認為有更多的意義，即在所謂「過剩人口」的產業預備軍中，發見其有着足以「調整」就業勞動者的工資，能使產業的迅速發展成為可能的，這一現實的機能。這點，已由下面的事實而獲得了證明，即：從十九世紀的十年代即已開始的資本制原來有的景氣變動，把大體上為十年或八年的週期正確地保持着而反覆着，有時把失業者逐出在街頭，有時則又能再度將其吸收。換言之，在當時，「全體就業」的可能性還被一般所相信着。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發生的失業的大量化與慢性化，終於把「過剩人口」問題作為觸及資本主義的本質的問題，而提起了。對於「全體就業」的信念，開始根本動搖了。馬爾薩斯的「法則」，到了這時，遂突然成了具有現實的意義了。但是同時，一般勞動者階級的意識，却已變得不復那麼從順得完全接受這個法則了。於是，在一方面，有西歐各國的國家失業保險制度的創設，在他方面，則以法西斯國家為主倡者的全世界的重整軍備計劃，被採取作為應付這事的對策了。並且在現存秩序之下的「過剩人口」問題的解決，除後者外別無他途，這事漸漸由事實表示着了。「窮國」、「人口過剩國」，其開發動尋求所謂「生命綫」，正是在這個時期。

所謂「過剩人口」的現象，固然是在一一般資本主義社會都可看到的事；可是同樣，他在資本主義以前也曾存在。並且那時的社會形態，等到變成物質的生產力的發展上的絕對的桎梏時，「過剩人口」的現象，就常常成為導致歷史的轉變的因素。資本主義的現階段，即被一般稱為獨佔金融資本的階

段，在一方面，行着龐大的資本的積集與生產的集中，在他方面，則不絕地產生着與此種積集和集中成為正比例的大量的固定化的「過剩勞動力」。即使在日本，在其獨佔金融資本的確立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那種傾向也急速地表面化了。那種傾向，特別是經過了從第一次大戰開始至一九三〇年的產業合理化的時代，益增其深刻性，而達到了「不是社會革命便是對外侵略」，此外絕無可走之路的地步；結果，由於軍部法西斯主義者的着了「先鞭」，而就成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

在自然與人口的關係上，則日本的確是世界上有數的人口龐大國家。這點在戰前如此，在業已喪失殖民地的戰敗以後的現在更是如此。波茨坦宣言對這個「危險無比」的國家，命令她以和平國家重行出發。可是正當關於「全體就業」的條件的檢討，漸次成為全世界的課題之時，「人口過剩國」、「窮國」日本的藉資本制的手段行和平的再建，這事是否可能，即使對於理論經濟學上，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考驗。停戰已三年多，日本人口的問題究竟在怎樣被解決着？最先有知道的必要的，是對現在及將來的日本具有決定的力量的美國的見解。例如一九四六年二月，盟軍總部的公共衛生福利部長賴姆斯上校，關於這個問題會這樣說：

「解決日本人口問題的方法有二種。一種是日本的高度的經濟建設，藉工業製品以謀食糧輸入；第二種是使勤勞者大量移居國外；再有一種是產兒制限。」

其後相繼被派遣的美國訪日經濟觀察團的各種報告，也是或多或少地作着與此相同的結論。響應着美國的這種意見，日本政府於本年五月自己發表的「經濟復興五年計劃」（第一次草案），對於「過剩人口」的解決的可能性，怎樣地以數字來表示着？——把這事檢視一下，是很有趣的事。那就是，以一九三〇年——一九三四年為基準的那個計劃，把工業生產提高至基準年度的一三〇%；而一方面，則因為把失業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比率，定為與基準年度相同即二·四%，所以其實際數字，反映總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着。再者，關於包括食糧部門的農林水產業，則定為基準年度的一〇五%，僅有極小的增加率。依據這個計劃，則：（一）工業生產的增加，足以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而使資本的可變部份即勞動所佔的比率，相對地降低；（二）不是提高食糧的國內供給度，而是由工業製品的輸出，以獲得輸入食糧。因此，即使假定今後的出生率等於零（！），現在人口中也至少有二

百萬以上的潛在失業人口的增加；並且達此種潛在失業人口數倍失業總人口，將陷於「地面上的無用的多餘者」的命運。更重要的，是在這個計劃本身就完全依存於海外市場的這一點。這個計劃所選定的海外市場，一旦拒絕工業製品（特別是消費物資）與原料及食糧之間的不等價交換，或認為此種交換不可能時，則這個計劃的實行當然不得不停止了。這點微之下面的事實，也很可以明白看取，那就是：在該計劃草案發表後未出數月的現在，國內人口推算較發表時高得多，而國際形勢又有變化，因此，這計劃草案就不得不作根本的再檢討了。

在戰後日本的再出發之際，其應成爲前提的條件，除了政治的民主化，經濟的社會化之外，沒有別的。可是對「全體就業」與食糧自給的實現並未表示熱誠的這個復興計劃的內容，可說首先缺乏上述的前提。因此，作爲其當然的結果，「窮國」、「人口過剩國」的呼聲，將較過去更強烈，而尋求所謂「生命綫」於國外的戰前路線，將再度被採取，這是充分可以預想的事。

三

於是，我們又得回到本文開頭所說的話了。那就是，在業已具有高度生產力的像日本資本主義這種國家，其不能由自己來養活的「過剩人口」的繼續存在，這事決非因爲自然條件的不具備，無非是繼承戰前及戰時的日本的社會形態，日益成爲生產力發展上的絕對的桎梏這事的左證而已。既然這樣，則要獲得適應生產力的人口法則，除了打破這種桎梏外便沒有別的途徑。波茨

日本的所謂人口問題

越南柔

一 表現在日本人口問題上的鄉愁

波茨坦對日宣言第八條說：「日本國主權應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以及我人將予決定之諸小島」。這尚未決定的「諸小島」，根據開羅宣言，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日本所奪取及佔領的太平洋上一切島嶼，中國東北、台灣及澎湖列島，以及朝鮮以外的，日本附近的「並不重要之島嶼」。所以日本的領土，大體上已不難視爲於前述四島，這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宣言所主張的日本和平經濟的確定。唯有這樣才可能。不用說，這是編及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的問題；在處於國際獨佔金融資本指導之下的現在的日本，會有很多困難。雖然如此，但是在日本還有應該從速實行的措施，即重要產業的國營化及其民主的管理，和農地改革的完成這二點。由於這二點的實行，上述的桎梏還有相當緩和的希望。因爲在前者，企業的經營可以在國民的基礎上進行，其因產業合理化或機械化而生的過剩勞動力，即可能被吸收。在後者，則從以本年告終的第二次農地改革中脫離的地主保有地的解放，以及達三百萬町步之多的未耕地的開墾等等，便可被包括在內。適應着經過這種過程而發展的生產力，漸漸實現向新的社會形態的推移。所謂「和平革命」，必須是這樣才對。但是，即使是這樣的辦法，也沒有被補好了平坦的道路。

一戰敗國日本的不幸，是在波茨坦宣言所示的正確方向，已由國際的種種關係而日益被歪曲着的一點。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在國內政治的主流中，過去曾舉雙手贊同「生命綫的獲得」的保守反動的流亞，又日益富於掌握權力的機會，但是在其反面，將近一千萬的失業及半失業大衆，被奪了「工作」與「吃」的權利，而在日益走近最緊張而唯一的路綫。這樣的深刻的現實的發展，如何能使人不預想「日本再度成爲世界和平及安全之威脅」的一天！即使從這個意味上說，國際的民主勢力的團結與鞏固，也是比什麼都被人們所希望的事。唯有這樣，才能把所謂「窮國」、「人口過剩國」這類昏話絕滅！

前日本的領土及殖民地的面積相較，差不多減少了四四%。一方面，由於日本的戰敗投降，其在國外的僑備大部分必須被遣歸。換言之，日本由於此次不義戰爭的結果，必須在上述四島約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面積上維持將近八千萬人口的生活。如果僅從日本現有耕地面積來看，則每平方公里必須容納一千三百二十人，則不難說是世界各國中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在二十年前，日本慶應大學教授清水清文郎會提倡依耕地面積計算人口密度，反對依領土面積來計算。當時據他的計算，日本的每平方公里的人口爲九六九人

比利士為三九四人，義大利為三〇五人，荷蘭為二七三人，英國為二二六人，德國為一八五人，瑞士為一六八人，法國為一〇八人；他以此個數字來舉動視聽，說：『從人口與職業的調和這一觀點看來，真是寒心！』（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金網』雜誌所載『人口問題及其政策』）假使他看到了今日日本的使耕地面積來計算的這個人口密度，恐怕不但『寒心』，說不定還會四肢冰冷吧。

事實上，日本在投降以後，其國內保守反動階層的意識的或無意識的代辯者，也的確因此而『寒心』乃至『四肢冰冷』的。例如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時事新報』社論說：『特別是日本，因為戰敗的緣故，其版圖變成了過去的大約一半，現在八千萬人口必須在本土四島上生活下去了。這樣，對於今後的日本，『人口與國土』的問題如何地深刻，已不問可知了。』本年三月一日『讀賣新聞』所載濱口雄彥『確立人口國策』一文中說：『日本當前所遇的食糧危機、住宅問題、以及由這些問題而生的社會不安，如果究其根源所在，則都是從人口過剩這事發生的。假定今天的日本人口只有五千萬人，那末一切問題都可以一舉解決，社會不安也不會有，國家會變成很明朗的姿態了。』並且說：『現在如果還不樹立人口過剩的對策，必將陷於極可憂慮的狀態。』八月十七日『每日新聞』社論說：『對於經濟力弱化的、自然條件惡劣、國際環境猶在未定之天的貧弱的日本，人口問題是極其重大的問題，可以無須多說。一言以蔽之，是人口太多了。』九月一日『讀賣新聞』的社論說：『總人口突破了八千萬，這是日本有史以來所未有的事；並且從去年十月一日起，僅僅在十個月內增加了一百六十萬人之多，這事即使把歸國者激增這一特殊情形置入及慮，畢竟也是重大的事實。……國土已被縮小，昔日的經濟已被破壞，移民海外的希望極少，我們每日為生存而在極度艱難困苦中奮鬥着。日本所有耕地的使用，已迫近最高限度，日本所需的食糧的輸入量，在最近將來決無減少之望，毋庸因為供應增加的人口，維持其生活，而那種輸入的需要量反而會增大。……』九月二日『時事新報』社論說：『在天然資源已喪失，產業發展已停止了日本，只有人口增加一事特別旺盛，因此，這事的壓力深刻地加在國民生活上，這是現實情形。』大來佐武郎在本刊二卷三期發表的『關於日本工業水準』一文中說：『據一九四七年一〇月的日本國勢調查，日本全國人口為七、八〇九萬人。這數字比一九四六年四月的七、三一一人，有四八八萬的增加。如果與一九三〇年的六、四四五人相較，則有了百分之二一二的增加。這是說，日本必須把等於中國六分之一的人口在等於中國三分之一的面積上養活。……日本的農業人口，自明治初年以來差不多並沒有什麼變化；所增加的人口，大部份是靠着工業的發達被養活的。因此，假使把工業已增加的人口放置不管，而僅把工業拆除，則數千萬的人口即將失去可以工作的職業，可以耕種的土地，而不得不在極度的窮困中陷於慢性的餓死吧。』以上這些，都足以表明他們在如何地對此次戰爭結束前的國土及殖民地面積積着濃厚的鄉愁，而對於現在的領土面積的狹小及人口的衆多感着深刻的憂慮。

不用說，日本由於戰敗投降，人口密度較前增高了許多，這是事實。即使不依耕地面積而依領土面積來計算日本人口的密度，則據本年八月十七日『每日新聞』所載，戰後日本人口如依八千萬計算，則每平方公里為二一七人（戰前為一九二人），比利士為二七一人，荷蘭為二六八人，居第三位；如果依耕地面積來計算人口密度，則日本耕地每平方公里的人口，為荷蘭（八三〇人）、比利士（七六〇人）等任何國家而上之。一方面，日本的人口密度既如此高，而另一方面，又有如前引『讀賣新聞』所說在十個月內增加了一百六十萬人之多的人口增加的速率。此外，更由於食糧的不足，失業者的衆多，遂發展成爲日本人口過剩的『寒心』的論據，不但大大地刺激了日本人民對未曾喪失殖民地四四％時的鄉愁，同時也使一般日本人民發生一種錯覺：日本人口過剩問題已成爲攸關日本民族生存的嚴重問題，非得趕快想法子解決不可。不用說，日本保守反動階層的代辯者也早已預備好了一套『解決』人口過剩問題的辦法的。

二 日本在戰前的人口政策

他們所預備好的一套『辦法』是什麼？還是此次侵略戰發動以前的一貫的老方案。日本在此次侵略戰前的一套人口政策，主要可歸納爲四種。
第一種是武力的領土擴張政策。他們極力宣傳日本人口密度太高，人口的增加率太快，這樣下去如何得了？一方面刺激日本人民對白種人佔領世界的反感，一方面又提供了歌頌帝國主義的『理論』的根據，造成武力擴張領土的張本。主張這種政策的人，其理論的出發點便是完全依據反革命的馬爾薩斯的『大人口論』，他們企圖對人口問題，從其與食糧問題的對比上加了解決。他們根本想不到日本食糧的不足是由於國內農業經濟的沒有民主化，沒

有合理化，封建的農村機構依然存在之故；更確當點說，他們並非沒有想到這點，然而爲了維護日本地主們的利益，根本就不想從這方面去實行。他們祇說，日本人口越來越多了，所以越來越吃不飽了；因爲食糧不夠，就得向國外去求取了。而他們所主張的向國外求取食糧的辦法，並不是從國外輸入食糧以補國內的不足，却是直接爽快擴張本國的勢力圈，在這個勢力圈內謀自給自足。大陸政策便是這種主張的具體表現之一。攫取台灣、朝鮮、中國東北以及華北爲殖民地，又製造「東亞共榮圈」，企圖把這個廣袤的地域都收在日本的支配之下，其目的都是想藉以安定日本本國的食糧經濟。

第二種是移民政策。主張這種人口政策的出發點，同樣也是依據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而且據霍布遜(G. A. Hobson)所說，在帝國主義時代，由工資較低的後進國家向工資較高的先進帝國主義國家的移民，其日趨增加是必然的，從帝國主義國家向後進國家的移民，則毋庸屬於極少數的例外；這點，他在「帝國主義論」中曾以具體的數字加以證明。日人風早八十二在「日本社會政策史」中也說：「日本的移民政策也依照這個法則，即決定移民的工資法則」而實行，這事證之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初期向北美移民，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朝鮮人向日本本部的移住，都可以證明。但是日本的移民政策，一方面固然依照霍布遜所說的法則進行；可是另一方面，其向殖民地移民，則顯然含有經濟以外的原因。那種移民必須受政府的特殊的訓練，而且他們在滿蒙的農業勞動並不能獲得所謂等價交換的工資，他們實際上支出着幾乎等於無代價的勞動。這種移民政策，一言以蔽之，有如日人淵真吉在「戰後失業問題」一書中所說，是「要把人口問題以軍國主義的作風來處理的日本的嘗試。」日本的依據工資法則的移民，由於一九二一年美國的禁止令，一九三八年巴西的禁止令，而歸於停頓；至於其對滿蒙的移民，則因日本人的不能忍受當地的自然條件，遂使這種以軍國主義侵略政策爲背景的武裝移民也歸於失敗了。

第三種是發展工商業即所謂「產業立國」政策。這種政策的論據，也認爲日本的農業受着「土地收穫漸減法」的限制，已難於解決日本人民的食糧問題，必須發展工商業，藉輸出品以換取食糧的輸入。不用說，藏在這種論據的根底裏的還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日本農業是否足以供給日本人民所需的食糧，這裏且不說。祇就發展工商業這事說，如果是以經濟民主爲根

據的發展，以換取國外的食糧，原沒有什麼不合理；可是問題是在，日本的所謂發展工商業，換句話說，即係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資本主義生產，是造成失業人口的原因所在，這種生產越發達，失業者越多，也就是越發增多相對的過剩人口，所以要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這一意味的發展工商業來解決人口過剩問題，本身便是一種矛盾。並且即使退一步說，由於工商業的發展，換得了足供日本人民所需的食糧，但也不足以解決日本全體人民的食糧問題，原因是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職業或工作才是獲得食糧的媒介，可是資本主義生產制度本身既是：「相對的過剩人口即產業預備軍的累進的生產」的泉源，是製造失業者原因，其爲不能解決食糧與人口問題，是很顯明的事。

第四種是產兒制限政策。這種政策的論據，在馬爾薩斯「人口論」中所提倡的「道德的抑制」，是世所週知的事。日本的正式提倡產兒制限運動，是在一九二二年山額夫人遊日以後。對山額夫人的思想首先表示共鳴的是石本惠吉、安部磯雄等，其後由石本靜枝（即現在的社會黨的加藤勸十的夫人）譯出山額夫人的著作，又由石山千代松、永井潛等從優生學的見地大大提倡產兒制限運動。總之，在日本當初極力提倡這運動的，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便是具有社會改良主義傾向的人們。這個運動的目的，不但想藉此避免貧窮，並且想造成優秀的子孫。但其動機則完全出於藉所謂「道德的抑制」以減少人口的增加速率，而謀食糧問題的解決。但是這種運動在戰前的日本，不過曇花一現，不久即因侵略主義的人口擴張政策而歸於斃命。特別是在此次侵略戰爭期內，日本軍閥政府所提倡的「生育吧！繁榮吧！」這口號之下，可說完全成了陳跡。

此外，日本在投降以前的人口政策，還有土木事業、歸農對策、開墾計劃、失業對策等，但都未認真實行。所以過去日本的主要的人口政策，不妨說盡於以上四種。

三 無反省的戰後日本人口政策

日本自投降以後所提倡的人口政策，在內容方面，除了武力的領土擴張政策不敢公然提倡外，其他則完全和戰前一樣，並且由於殖民地喪失，人口密度增高之故，對於移民政策、發展工商業、產兒制限這三種人口政策的提倡，反而有較戰前更爲熱烈之感。

關於移民政策，雖然因爲日本處於戰敗國的地位，和約也未成立，而且

過去日本以軍國主義政策為背景，武裝移民在國際人士腦子裏留下的印象太深刻，此時此地，好像還未明目張膽地主張。雖然如此，可是片山內閣時代的蘆田外相，還是作為日本保守反動階層的忠實的代辯者而情不自禁地公然說出了移民台灣的主張。雖然因為當時曾引起了國際間幾乎一致的抨擊，其後政府當局好像已不再公然作此主張的勇氣，但是這事決不是表示日本保守反動階層的代辯者將永不提出移民政策的主張。事實上，例如最近「東洋經濟週報」所載上田文三郎的提倡日本移民至新畿內亞的一篇文章（文見二月二日大公報），便可說超越着時間而影響蘆田的事實表現。至於將窺伺着適當的時機，特別是在和約成立，獲得了與他國對等交涉的地位以後，由政府當局正式主張移民以解決日本人口問題，更是充分可以預料的事。

關於發展工商業以解決人口問題的政策，則幾乎是日本朝野完全一致的主張。就輿論界說，則例如一九四六年一月二〇日「每日新聞」的社論說：「經濟危機十分迫切，所以除了仰賴外國原料等的輸入外沒有別的辦法，但是最緊要的，這是在日本全體表示旺盛的生產復興的意慾，造成（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協力體制。」同年一月二四日「時事新報」社論中說：「特別是為了確保將來的就業人口能完全就業起見，除了期待和平工業、礦業及交通業的再建與發展外，沒有別的辦法。……耕地狹小，農業人口有其限度，商業人口則從來就有過多的傾向，所以今後必須致力於水產業、工礦業、特別是加工製造業等，這才是再建人口收容力的第一步，唯有這樣，國民所得才能上昇，所謂國內市場的開拓也才可能。」大來佐武郎在前引一文中說：「總之為了養活八千萬人口起見，非輸入龐大數量的這些物資（食糧、原料）不可。……這種輸入物資不是無代價可以獲得的，……無論如何非依賴工業製造品的輸出不可。」至於日本政府方面，則自幣原內閣以來，歷屆內閣無不以振興工商業為解決人口問題的方法，特別是在蘆田內閣所發表的經濟復興五年計劃草案中，最可以具體而明白地看取這點。據本年五月十八日「朝日新聞」所載這個草案的擬具主旨看時，可知這個計劃草案是把一九五二年的日本人推定為八、二九三萬人，把工業生產的復興步調較農業生產特別提得快，並且預備把輸出品中的中心從纖維製品轉移為機械及化學製品。而且在這個草案中特別指出日本農業生產力增加的困難，所以把重點置在工礦業生產。據最近（一月十七日）東京電訊，日本經濟復興計劃委員會擬將五年復興計劃中最後一年的人口估計，從原來的八、二九三萬人提高至

八、七六六萬人，因此，說：「在海外市場及其他方面，於將來之產業構成中必須更增加化學工業所佔之比重。」這是說，第二次吉田內閣成立後把未來的日本人口估計得較蘆田內閣時代為更大，同時，其在主張發展工商業的強度上較蘆田內閣時代為更甚。但在根本無視農業生產增加的可能性，而專門偏重工商業的發展以解決日本人口及食糧問題的一點上，則蘆田內閣與吉田內閣是完全一致的，不但這兩屆內閣一致，不妨說自幣原內閣以來共通的傾向，不過在最近兩屆內閣表示得特別明顯與具體而已。

關於產兒制限這一消極的人口政策，雖在侵略戰爭中軍閥內閣時代一度斂跡，但自投降以後，由於人口密度的增加，國民體質的低落等事實，而又復被一部份日本人所提倡了。例如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四日「時事新報」社論中說：「在人口過多，而又沒有足以養活他們的充分的經濟力時，無論如何必須設法減少人口的方法。但是在限制人口時最重要的一點，便是不能以僅僅減少人口這一消極的政策為已足，却必須以增加優良人口這一積極的政策，把優生學的思想普及於一般人民，由於這樣的結果而使人口數的增勢減殺。有名的「大口論」的著者馬爾薩斯，從人口與食糧的增加比率上着想……而說除了實行生育的道德制限以外沒有別法。日本的現狀，便是在如何實施此種道德的制限。」濱口雄彥在前引的「確立人口國策」一文中也說：「各國的所謂產兒制限，其目的，普通總是在增進個人的幸福，享受更好的文化生活，可是日本的現狀，則不容那麼優裕；產兒制限在日本，是決定日本民族生死，日本國家能否再建的關頭。」本年八月一七日「每日新聞」社論說：「要解決日本人口問題……除了出生率的抑制——產兒制限以外沒有別的方法。……政府必須放棄過去的（增加人口的）人口政策，轉向為「從量到質」的政策，把這個政策對國民徹底實行。」九月一四日「讀賣新聞」社論說：「在產兒制限，優生學的處理之類的部面，日本政府雖已出發了第一步，可是比了這些問題更重要的是，必須設法日本國民究竟為什麼在繼續着這樣不合理與無自覺的生育這一根本問題。……要而言之，必須提高個人的文化程度與生活水準。」

此外，日本自投降以來所提倡的人口政策，關於開墾計劃，失業對策，土木事業等也被提及，特別是歸農論與開墾計劃，不但輿論界加以提倡，而政府也曾於一九四五年決定了一個「緊急開墾事業綱要」，預備以五年計劃開墾一五五萬町步（每町步等於二·四五〇七英畝），其中北海道七〇萬町

步，北海邊以外八五萬町步，並以六年完成填拓面積一〇萬町步，以三年完成面積二一〇萬町步的土地改良；可是事實上，這個計劃並未積極推行。所以戰後日本所提倡的人口政策，其主要的，也不妨視為限於移民政策、發展工商業政策、產兒制限政策；更因移民政策在此時此地的日本，尚未到積極主張的時機，所以主要的人口政策，不妨視為限於發展工商業及產兒制限這兩種政策，尤其是其中前者，不妨視為包括日本政府內的日本保守反動階層代理人主張得最熱烈的人口政策。

四 戰後日本人口政策能解決人口問題嗎？

前面曾說過，以解決人口問題為目的的移民政策，可分為二種：一種是後進國向先進帝國主義國家的移民，也就是純粹的移民；另一種是超越經濟原因的移民，也就是含有軍事性質的移民。關於前者的日本移民，已因美國及巴西等的禁止令而失敗了，其實即使不受禁止，也決不能解決日本的人口問題；其原因是：「移民未必能改進勞動者的生活，解決國內的失業問題。」就日本說，即使每年有一百萬移民海外，可是結果所生的國內生活力的增高，立即招致人口的增加，而足以減銷移民的效果；何況像日本那樣每年只有數萬人的移民，其為不能解決人口問題，更顯而易見了。至於後者的日本移民，即以軍國主義政策為背景的武裝移民，他們既要負擔國內一般農民為更苛烈的勞動，又須忍受幾平等於零的收入，他們完全受帝國主義者、大資本家的驅使而成為犧牲品；侵略戰期內所謂「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這一移民團體所嘗的苦盃，可說完全由於企圖以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這一形態來解決食糧與人口問題的日本反動學者、軍人、政客之罪戾。片山內閣時代蘆田外相公然提倡的「移民台灣」的政策，很明顯是屬於後者的移民政策的範疇的。雖然這種論調因國內外一致的抨擊而大體已歸於寂滅，然而有如前面所指出，這種政策，其將在成熟的時候捲土重來，是不難想像的。萬一日本仍將採取這種帝國主義的反動的移民政策，其結果，祇是重演一次「開拓滿蒙」的悲劇，其將歸於失敗而不會解決日本人口問題，是可以預斷的。

產兒制限，如果僅從減少人口或制止人口增勢的立場看時，當然不能說它不是一種有相當效果的人口政策。然而日本現在的人口問題，與其說在將

來的人口過剩，母庸在今日的一千萬失業者，以及數千萬的失業者家屬的這一當前的問題。縱令因產兒制限而發生了制止人口增加的效果，但亦不足以解決今日日本的泛濫的過剩人口。何況，據我人的意見，所謂人口的過剩，決不是從人口增加率或人口密度的增高而發生，却是從社會組織發生的。如不從社會組織方面着手，而祇從絕對地限制人口這事着想而實行產兒制限，其結果徒足以招致這個民族的退步衰亡而已。日本的學者小池四郎遠在二十數年以前（一九二六）即曾在「非資本主義的人口論」一書中說：「今日的人口過剩，決非如馬爾薩斯所說那樣的絕對的。並不是和人口增殖數相比，食物是相對地缺乏；却是並不去變造食物，生活資料的寶庫的鑰匙，握在資本家的手裏。正因為資本家不肯開這個寶庫，才發生過剩人口。」所以他說：「人口問題的解決的關鍵，還在對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處置。」他對於產兒制限，則說：「在人口過剩的根本矯正還不能達成時，這是不不得已的方策。」可是他說：「既然從人口問題上不得不實行產兒制限政策，則我們對此事的心裏，至少要有饒幸死罪囚入刑場的檢察官的惘然之感。」不過在今日看來，這種論調還是不免於不徹底，因為我們覺得問題是在，怎樣努力作「人口過剩的根本矯正」，而不一定須要「送死罪囚入刑場」。

至於以發展工商業為解決日本人口問題的對策，則唯其因為它是日本朝野幾乎一致主張，且是日本政府的人口政策的重點所在之故，我們更有加以慎重檢討的必要。

本來，如果立脚於經濟民主的基礎而發展工商業，其成果為日本全體人民所享受，則不論食糧問題和失業問題都可以獲得解決，所以應當說是解決日本人口問題的理想的方法。但是在今日日本的現狀下所提倡的以發展工商業為重心的經濟復興，却並不能解決日本人口問題；不但不能解決，反而因為足以益發增加失業人口，而將使日本人口問題益趨嚴重與深刻。在闡明這個理由之前，這裏有先把人口過剩所以發生的原因略說之必要。關於這點，日人河上肇氏在其所著「作為資本主義末期症狀之一的人口過剩的呻吟」（「社會問題研究」第七三冊）中曾有簡明扼要的解說，這裏不預備將其全部介紹，祇引用其中一節吧：「資本的增加率比了人口的增加率大得多。而且資本的構成的隨着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愈益成為高級，所以它不但較人口增加率大得多，而且是加速地大得多。可是這事，無論資本的自己膨脹力如何旺盛，畢竟是不能實現的事；而且其不能實現的程度，隨着資本主義生產

的進行而益發成爲劇烈。這樣，其必然的結果，就成爲資本所不需要的——即資本家所不能備的——過剩人口的出現，及其遞次的增大。『這便是所謂「產業預備軍」即過剩人口發生及增大的原因。既然人口過剩的原因在此，則現在日本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要藉發展工商業以解決人口問題，這事又將如河上氏所說：『儘管在常識上看來覺得如何「不錯」，但在科學的立場看來，却是滑稽之至。』

即使退一步，我們承認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也有其「理由」，並且承認他主張的食糧增加率遠不及人口增加率一點爲「正確」，我們也不妨提出一點來反問：以今日日本的土地是不是真的已達到了不能生產足以養活今日日本人口的食糧？

先就日本的耕地面積說。自然，如果備從現有的耕地面積說，則日本人口密度的確很高，據本年八月一七日「每日新聞」所載：每平方公里耕地面積的人口密度，日本爲一、三〇七人，較荷蘭的八三〇人及比利時的七六〇人還要高，佔全世界第一位。但是，這畢竟是指現在的耕地面積而說，並非指包括尚未開發的可耕地在內的面積而言。在此次大戰未發生時，波樸夫（F. P. Cook）曾說：『在日本地質最肥沃的北海道，其人口是這樣稀薄，而又有未開墾的良好農業地，就特別值得我人注意。北海道之廣，差不多佔其全國面積的二五%，然而在那裏的，只有日本人口的約二%，一平方公里平均約爲三二人，其中有很多地方較此數字低得多，有一平方公里只有一〇人的地方。』（摘譯「日本經濟論」六〇頁）。即使日本投降以後，波樸夫也還說：『在日本，有着與現在的耕地面積大略相等的可耕地。』（一九四七年三月號「文化評論」七七頁）。可是爲什麼不去利用？則波樸夫又說：『這在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各種條件之下，要實現是不可能的。貧乏的零碎的農民，對於獲得這種土地所必需的資本，是一點也沒有；至於那些基於封建的原則而榨取着的地主，則寧願投資於利得較多的都市的各種企業的。』（「日本經濟論」七〇頁）。並且爲地主作代辦者的日本政府，其不會努力於可耕地的開拓，而祇是極力從殖民地及外國攫取約等於日本本國消費量的百分之二〇，也屬當然的事。正因如此，『自明治時代以來，雖然與一切的經濟力的發展同時，農業生產力亦有了發展，但在耕地面積方面並未有飛躍的發展。在明治十一年日本的稻作總面積爲二百四十九萬町步，其後雖有官民的擴張耕地的「努力」，其增加却遲遲不進，即使在最高的昭和七年（一九三二）也

祇爲三百二十六萬町步。換言之，在五十四年內只增加了七十七萬町步，以百分比說，不過增加了三二%。而且其後還有停頓乃至漸減的傾向。』（「阿部源一」人口食糧政策的發展形勢「九八頁」）。

在戰後，日本政府曾於一九四五年一月決定了一個「緊急開拓計劃」，這事在前面也曾提及，其預備開拓、填拓、改良的土地面積，在前面也曾說過。據日本政府的預期，在十年後即可增產食米二、一二〇萬石。可是結果怎樣？據「東洋經濟新報」（本年六月五日）說：『一九四五年度，因爲這計劃是在同年一月才決定的，所以平均面積的增加不能如原來的預期，獨有可說，可是一九四六與一九四七這三年，各種準備已經完成，當然應計劃開墾三年度的平均面積即合計六二萬町步，但是只計劃開墾三三萬四千餘町步。再者按照當初計劃，每年應平均開墾三一萬町步，則自一九四五至四七這三年應爲九三萬町步，但實際上只開墾了二九萬餘町步，即不過三一%而已。』再從開墾地的耕種面積看時，則『如果拿開墾地二九萬七千餘町步來作對比，其中被耕種的只有一〇萬七千四百餘町步，即三七%而已。』關於填拓地及土地改良事業，其情形也大致相同。按當初的計劃，在一九四七年應增收米二六五萬石，可是實際則不到一百萬石。總之，戰後日本政府以開拓耕地爲目的的「緊急開拓計劃」是失敗了；日本政府自己並否認失敗，這點，徵之農林省於一九四七年一月決定改變實施方法一事，也可獲得證明。因爲在新計劃中，雖把全部完成的年限從六年延長至十二年，可是面積則並非由舊計劃的三七五萬町步增加一倍，而祇爲六六九萬町步，並且按舊計劃，十年後日本食糧可以自給，而新計劃則即使在十年後也不能自給。但是，即使是這個減低了增產目標的新計劃，在今日這樣日本的現狀之下，還是不能成功的。這原因，非止如「東洋經濟新報」所說，在於「沒有具有經驗的事業專家去担任，與官僚的缺乏才能」；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波樸夫所說：『在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各種條件之下，要實現是不可能的。』總之，在現在的日本不是沒有可耕的田地，不是不能獲得足以自給的食糧，問題是在日本的經濟制度不容許它實現而已。否則，以「與日本現在的耕地面積大略相等的可耕地」，去生產日本所缺的百分之二〇左右的食糧，決不是困難的事。因此，即使承認馬爾薩斯「人口論」所說的食糧增加率不及人口增加率一事爲「真理」，也不能說現在的日本土地及其可能生產的食糧，已不足以解決日本的人口問題。

再就日本的農業生產關係說。日本的農業，在大力勞動的集約化一點上，從西洋人稱日本農業為「園藝」一事看，也可想見其高度；然而僅憑人力勞動的集約，畢竟不足以大量提高農業的生產性，唯有農業生產技術的科學化，才是提高農業的生產性的重要條件。一九四五年在坎白克舉行第一次國際食糧農業會議時，當時美國農業局長安德遜曾說：『在人類的歷史過程中，技術與科學的發展，已使飢餓成爲不必要的了。』可是要使日本的農業能因應用新的技術與科學，提高其生產性，以驅逐飢餓，根本問題還在如何把半農奴狀態中的日本小農、貧農及佃農從封建的農業生產關係中獲得解放。盟總針對這事而發出的命令便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九日的「日本農民解放令」，日本政府根據這命令而計劃及實行的便是所謂「第一次農地改革案」及「第二次農地改革案」。自從第二次農地改革正式實行以來，一方面固由於制度本身的缺陷，而另一方面却也因爲日本資本家及地主頑強地破壞，遂使日本的封建的農業生產關係下喘息着的一般農民並未獲觀解放的曙光，他們依舊只能在極其零碎的土地上從事人力集約的農業勞動，當然談不到有餘力可以應用新的技術與科學，更談不到農業生產性的提高。

即使從上面的論述，也足以證明日本的農業並未達到如馬爾薩斯所說「土地收穫漸減法」發生作用的程度。何況，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本身便是一種眞理的幻影，而不是眞理自己。

五 解決日本人口問題應走新的方向

日本人口問題

甲 日本全國人口總調查

日本人口，在德川時代之前半期，因乏統計，無從稽考。至德川後期，據日本文獻記載，在一七二六年（享保十年）計有二千六百五十四萬五千人，至一八二六年（文政十一年）爲二千七百〇六萬四千人，至一八四六年（弘化三年）爲三千六百九十九萬八千人，此爲德川時代日本人口之數字也。至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減至三千四百〇八萬八千人，至一八九二年（明治二十五年），又增至四千〇五十八萬八千人，至一九〇七年（明治四十年）增至四千七百四十一萬六千人，此爲明治時代日本人口之數字也。至一九一七年

戰後日本保守反動階層的「輿論」，幾乎一致在強調着日本人口密度的如何高，人口增加率的如何速，同時也幾乎一致在誇張着食糧對人口的相對的不足一事的「嚴重性」。這事是他們引爲要求美國扶日的「理由」所在，也是重作帝國主義的向外發展的伏筆所在。我們不應容許這種論調欺騙會被其蹂躪的盟國人民，同時也不忍同樣會被其欺騙的日本人民重受欺騙，所以不嫌其煩地願意再度在此簡括地指出其反動性。

日本保守反動階層及其代官者所強調的日本人口過剩，以及其主張的日本人口政策，其最根本的錯誤，是在完全以馬爾薩斯的反革命的「人口論」爲其「理論」的出發點。如果依據馬爾薩斯的「理論」企圖解決日本的人口過剩問題，則問題不但不會獲得解決，相反地是，日本人口將越發「過剩」。因爲那是替資本家辯護的人口「理論」，不是打開「生活資料的寶庫」的「鑰匙」。今日的人口過剩問題，簡單一句是失業問題；因此，必須放棄從人口與食糧的對比上去論究的態度，應該從人口與職業的對比上去求解決。等到日本「全體就業」獲得實現的一天，便是日本人口問題獲得解決的時候。可是如何才能徹底實現「全體就業」？則因爲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內部便含有必然使失業率增加的矛盾，所以要期待在現在的日本經濟制度下能徹底實現「全體就業」，從而徹底解決日本人口問題，畢竟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根本的一點，還在日本的經濟民主化。否則，任何人口政策都是徒然的。

張白衣

（大正六年）增至五千四百二十三萬四千人，至中日戰爭爆發之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口爲七千一百二十五萬三千人。茲將日本人口自一七二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之統計列表于后：

一七二六年	二六、五四九
一七四四年	二六、一五三
一七五〇年	二五、九一八
一七六二年	二五、九二一
一七六八年	二六、二五二
二七八〇年	二六、〇二一

一七八六年	三五、〇八六
一七九二年	二四、八九一
一八〇四年	二五、五一八
一八一六年	二五、六二二
一八二八年	二七、二〇一
一八三四年	二七、〇六四
一八四六年	三六、九〇八
一八七二年	三四、八〇六
一八七七年	三五、八七〇
一八八二年	三七、二五九
一八八七年	三八、七〇三
一八九二年	四〇、五〇八
一八九七年	四二、四〇〇
一九〇二年	四四、九六四
一九〇七年	四七、四一六
一九一二年	五〇、五七七
一九一七年	五四、一三四
一九二六年	五六、七九八
一九二七年	六一、三一七
一九二九年	—
一九三〇年	六四、四五〇
一九三一年	六五、三六六
一九三二年	六六、二九六
一九三三年	六七、二三九
一九三四年	六八、一九五
一九三五年	六九、二五一
一九三六年	七〇、二五八
一九三七年	七一、二五三

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七年止八年間，日本人口由六千四百四十五萬人增至七千一百二十五萬三千人，即八年間增加六百八十八萬三千人，平均每年增加人口約八十五萬人。自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五年間計算，由六千七百二十三萬七千人增至七千一百二十五萬三千人，計五年間增加四百一萬四千人，亦即平均每年增加八十二萬八千人。依此推算，可知在中日戰

爭前日本平時人口增加每年約八十萬人左右。但自戰爭爆發後，此日本人口增加率受極大影響，由于青壯年之徵赴戰線及日本士兵戰死戰傷與俘虜之結果，日本人口生產自然減少。同時日本人民受戰爭經濟統制影響，勞力增加而營養減少，其死亡率亦較平時為多。如此日本人口當趨于停止增加狀態。

依據昭和二十三年版（一九四八年）日本「國勢圖」會載，日本人口自七七事變迄今之數字如后：

一九三七年十月	七一、二五三、〇〇〇
一九三八年十月	七一、二二三、〇〇〇
一九三九年十月	七一、八七六、〇〇〇
一九四〇年十月	七三、一四、〇〇〇
一九四一年十月	七三、九〇〇、〇〇〇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七一、九九六、〇〇〇
一九四六年四月	七一、八七六、〇〇〇

依據聯合國統計月報（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37	71,253,000
1938	72,223,000
1939	72,876,000
1940	73,114,000
1941	74,067,000
1942	75,114,000
1943	76,033,000
1944	73,072,000
1945	71,996,000
1946	73,114,000

統計月報附註，一九四四年，日本人口係除去軍隊數目，一九四五年係除去軍隊及僑居外國人。

一九四六年日本人口據日本「國勢圖會」（昭和二十三年版）發表為七千二百八十七萬六千人，據聯合國統計月報載為七千三百一十一萬四千人，此數字是否正確，似仍有詳加調查之必要。

中日戰爭時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口為七千一百二十五萬三千人，一九四六

年四月「國勢圖會」發表七千二百八十七萬六千人，較戰前增加一百六十二萬三千人。據聯合會統計月報發表一九四六年為七千三百一十一萬四千人，則比戰前增多一百八十六萬二千人。但依據筆者粗枝大葉估計，八年戰爭中日本人似無增加可能，倘有增加，則決非由于人口自然增加，而由各地撤退日僑集中日本本土所致。茲將筆者所得材料估計如下述。

乙 戰爭對人口之影響及現在人口之估計

一九四〇年十月八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教授橋爪明男氏曾面對裕仁報告「戰時日本經濟真相」，其中關於日本人口，指出「因戰爭而增加率即告停滯」。(見東京朝日新聞一九四〇年十月九日)此為證明日本人口在戰時增加率已停滯。又據一九三九年八月之日本國勢圖表月刊社說，題為「日本出生人口減少之影響」，茲摘要如下：「日本出生數，在最近數年間，每年在二百十萬至二百二十萬人之間，一九三八年之出生數為一百九十二萬八千人，比前年減少二十五萬人。一九三八年之增加率，六十六萬八千人。考日本人口增加率最多時每年在百萬人以上，最少時亦有八十萬以上，而現在已跌落至七十萬人以下。一九三九年以降之出生減退當然比一九三八年尤為深刻。而一九三九年以降，政府已停止人口統計之發表，故不得而知，倘以一九三八年出生數字推算一九三九年，則可測定更減二十萬人之出生數字，此數字當比戰前減少一半。」由上述數語，已足證明戰爭對日本人口之影響如何？

倘自一九三七年以來至一九四八年止十一年間，如無戰爭影響，則日本在此十一年間之人口增加率將如下表所示：

一九三七年	七一、二五三、〇〇〇
一九三八年	七二、〇五三、〇〇〇
一九三九年	七二、八五三、〇〇〇
一九四〇年	七三、六五三、〇〇〇
一九四一年	七四、四五三、〇〇〇
一九四二年	七五、二五三、〇〇〇
一九四三年	七六、〇五三、〇〇〇
一九四四年	七六、八五三、〇〇〇

即倘無七七戰爭發生，則日本人口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可由七千一百二十五萬三千人增至八千〇〇五萬三千人。即此十一年來應增加八百八十萬人。

但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間的八年戰爭時間，尤其自一九四一年後又發生太平洋戰爭，日本戰區擴大，動員兵力增加，以及中英美等聯合組織以後，日本本土亦深受轟炸之悲慘結果，其人口生產率之逐漸降低，縱無數字統計，亦可想像得之。

此八年來日本人口直接受戰爭而死者，據日本國會報告如后：「此次戰爭中戰死者數及行方不明者，陸軍方面約三十五萬人(其中死于戰場者為二十五萬人)，海軍方面約十五萬九千人。陸海軍合計約為五十一萬人。此死者數約合日本二十歲至四十歲階級之男子人口總額的百分之五，即青年壯年每百人中有一人死。此外因本土空襲而炸死者約二十四萬一千人，此為日本內務省所報告者，因此次戰爭而直接死亡者共計約七十五萬人。」筆者對此報告不甚相信。日本對華侵略戰爭四年，對盟國戰爭四年，在此八年戰爭僅死亡海陸軍五十一萬名，平均每年僅死亡六萬三千七百五十人，可知其決不可靠。

據我國主計處依據軍令部直接報告：「各戰區戰績統計，一九三九年全年作戰次數為七千七百六十七次，斃敵計四十一萬〇〇九十五人，俘敵為五千九百五十九人。」我方統計當較為可靠，是則可知日本在一年中已死亡軍隊四十一萬人，八年中死亡決不止五十一萬人。

筆者曾作日本兵力資源估計如后：

一九三七年七月至十二月	三一〇、九四〇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十二月	六二一、〇〇〇
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十二月	六二一、〇〇〇
一九四〇年一月至十二月	六二一、〇〇〇
一九四一年一月至十二月	六二一、〇〇〇
一九四二年一月至十二月	六二一、〇〇〇
一九四三年一月至十二月	六二一、〇〇〇
一九四四年一月至十二月	六二一、〇〇〇
一九四五年一月至十二月	六二一、〇〇〇
一九四六年一月至十二月	六二一、〇〇〇
一九四七年一月至十二月	六二一、〇〇〇
一九四八年一月至十二月	六二一、〇〇〇

一九四二年一月至十二月	一、二四二、〇〇〇
一九四三年一月至十二月	一、二四二、〇〇〇
一九四四年一月至十二月	一、二四二、〇〇〇
一九四五年一月至八月	八二八、〇〇〇
總計	七、四〇〇、六九〇

即依筆者估計，日本此次戰爭中，士兵死亡、傷俘累計當為七百四十萬〇〇六百九十大。其中死亡者當為三百七十萬左右。

日本人口出生數在一九三六年為二百二十萬人，同期間日本死亡數為一百二十三萬人，生死差額為八十七萬二千人，此即為日本人口自然增加數。戰後死亡人數當受戰爭間接影響而增加，出生則因兵力動員于戰場自必減少。據日本自身報告，戰時日本軍隊在國外者約有三百四十萬人，包括隨戰爭而派遣國外者約有六百六十萬人，再加每年死傷軍隊四十萬人至八十萬人而又須時時補充，日本出生率在一九三九年已降為一百九十萬人，而死亡率（除戰死者）則增為一百二十七萬人，結果自然增加率降至六十三萬人。如果再加入戰死者四十一萬人，則一九三九年自然增加率僅為二十二萬人。太平洋戰爭後日本本土受慘烈轟炸，本國人民死亡率當然增加，又因戰區擴大戰死者每年約八十萬人以上，故其自然增加率不僅減少，不僅停滯，且有人口逐年低落之可能。受傷者雖不能認為對生育無絕對影響，但因受傷而影響生育亦為明顯之事實。筆者所見日本內閣統計局調查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口自然增加率每年有一百萬人以上，甚覺可疑！縱有此種事實，必因日本政府戰時獎勵人口政策所致，但此種後果因非青壯年所生，對將來日本人口健康上亦必有惡劣影響。

依據筆者估計，日本人口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止八年間，日本出生數字平均每年一百九十萬人，日本死亡人數（包括戰死及受戰爭而死之人民）平均每年一百九十六萬五千人。日本人口在一九三九年為七千一百二十五萬三千人，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八年間出生數字累計為一千五百二十萬八千人，死亡累計為一千五百七十二萬人，加減結果，即為一九四五年八月止日本人口應為七千〇七十五萬三千人。

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後，日本人口動態漸趨恢復常態，據聯合國統計月報調查如后：

日本人口出生及死亡數字（單位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	一九四六年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九四七年一月	二月
出生數	一四〇、六〇〇	一四四、七〇〇	一四〇、九〇〇	一二五、八〇〇	一二七、八〇〇	一三九、〇〇〇	一六一、九〇〇	一七六、七〇〇	一九三、五〇〇	一九〇、七〇〇	一九六、〇〇〇	一八四、〇〇〇	二七三、五〇〇	二二二、四〇〇
死亡數	二四八、六〇〇	二三七、五〇〇	一九〇、三〇〇	一五六、九〇〇	一四八、三〇〇	一五七、八〇〇	一四五、八〇〇	一四二、三〇〇	一四七、三〇〇	一五四、五〇〇	一三三、五〇〇	一二六、八〇〇	一二七、五〇〇	一一九、三〇〇

即自一九四五年八月以降至一九四七年二月止，日本出生人口累計為三百〇八萬七千二百人，同期間死亡人口累計為二百七十九萬三千六百六十二人，如此可知一九四七年二月止，日本人口當為七千一百〇四萬六千六百六十二人。再推以一九四七年一月至二月出生與死亡數字推算，日本人口增加率每月約為十三萬人，由此推算，則一九四八年底日本全國人口當為七千三百九十九萬六千六百六十二人。戰後日本海外僑民被送回國者，約在一百三十萬人，故一九四八年底日本人口約為七千五百二十萬人。倘再加我國東北尚未遣回本國之日軍約七十萬人，則可知日本全國人口今已達七千六百萬人左右。

丙 青壯年 齡階級之減少與婦女過剩

筆者估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止，日本人口總數當為七千六百萬人左右，比一九三七年七千一百二十五萬三千人，增加四百七十四萬七千人。但倘無

此次戰爭，則日本人口在一九四八年應為八千〇〇五萬三千人。是以筆者可下結論，日本因此次戰爭，人口損失當為四百〇五萬三千人。

自一九四五年八月戰爭結束後，日本人口雖漸復常態，但因國土面積縮小，殖民地之失却，日本政府雖欲獎勵人口，事實上亦感困難。同時深信今後日本人民因糧食不足而營養不良，死亡率將逐漸增大。例如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日本死亡人數僅八萬八千四百人，自後即一路增加，至一九四七年增至十一萬九千三百人，增加三萬九百人。

此外更重要之問題為日本人口因特定年齡犧牲之多，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後仍有出生孩型，惟欲期其補充，至少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〇年。特定年齡即青壯年，此等青壯年乃為一國經濟文化之基本力量，日本欲期經濟文化復興，至少當須待至今後十餘年至二十年。關於此問題日本國勢協會在戰爭爆發之初亦已有注意，茲錄其一九三九年八月日本國勢協會月刊社說如后：

「縱令幸而戰爭不延長，但出生之減少，在今後數十年日本人口之構成上，某種特定年齡階級之人口與其他階級之不均衡，將對日本國防與產業及其他發生極大之影響。一九三八年出生比例年減二十三萬人，雖謂僅一歲未滿之小孩，但要知道二十年後之二十歲人口，至少要減少十六萬八千人（扣去死亡率百分之二十七計算）一九三九年以降之出生減退比一九三八年尤為深刻，倘中日戰爭繼續五年，則經戰爭後二十年後二十一歲至二十五歲之人口將比常態減一百六十五萬人。元氣活潑之青年男女之減少，對於國力各方面當然有巨大影響。」

事實顯明，日本二十五歲至二十九歲青年男子，一九二五年十月有二百二十五萬六千人，至一九四六年僅有一百八十一萬六千人，但一九二五年日本全國人口不過五千六百萬，而一九四六年人口總數則有七千餘萬人，可知日本男性青年缺乏之程度。

更有一嚴重問題亦值得注意，即日本婦女戰後發生遺剩，尤其青年階級更多。茲將國勢協會統計錄后：

日本人口年齡別統計表（一九四六年）（單位千人）

年齡	男性	女性
〇—一四歲	一三三、二三五	一三九、九二〇
一五—一九歲	三、九〇七	三、九八八
二〇—二四歲	二、五四〇	三、四八四
二五—二九歲	一、八一六	二、八四七

三〇—三四歲	一、九七八	二、六四九
三五—三九歲	二、〇六七	二、三七八
四〇—四四歲	三、八七〇	三、八二八
五〇—五九歲	二、八〇四	二、七七〇
六〇歲以上	二、五二九	三、二四四
計	三、四七四	三、八二六

由上表可知日本人口婦女多於男子，婦女有三千八百二十二萬六千人，男性僅三千四百七十四萬九千人，即女性較男性增加三百三十七萬七千人。自一歲至十九歲者男女相差尚少，但自二十歲至二十四歲者，男性僅二百五十四萬人，女性竟有三百四十八萬四千人，又自二十五歲至二十九歲者男性僅一百八十一萬六千人，女性則有二百八十四萬七千人，三十歲至三十四歲者男性僅一百九十八萬八千人，女性則有二百六十四萬九千人，總計自二十歲至三十四歲之青年壯年男子為六百三十三萬四千人，女子則有八百九十八萬人，即婦女比男子增加二百六十四萬六千人。

因戰時出生率之低降，深信今後十餘年中青年年齡階級之人口漸趨降低。而此階級之兩性平衡發展，亦惟有待於今後十餘年後方得實現。

總之，戰後日本人口雖較常態發展為減少，但事實上自一九四八年比較前增加四百萬人（尚有七十萬人左右留在中國東北），因國土之受戰爭結果而縮小及殖民地之失却，以及海外僑民之被遣送回國，在生活上自然有種種問題。最主要者莫如糧食問題。日本如何解決其本身人口問題，則非在本文範圍之內。惟筆者可供日本為參考者，日本必須儘量開墾其本身之荒地，凡可利用耕種之荒地，必須均加利用。桑田必要時可以設法減少而改為耕地，以增食糧生產。生絲雖為日本戰前貿易主要輸出品，但因美國發明尼龍絲後，生絲之前途至為悲觀。日本今日唯有設法自給自足，首先尤須增加農產而解決其本身食糧問題。同時日本在此糧荒時代，對於生育必須有相對的限制，此種限制實為日本目前所必須者，蓋如不加限制，已出生之嬰孩均將受其影響，因營養不良，必致于同歸于盡！

歡迎向本刊直接訂閱

日本人口膨脹解決的途徑

李 毓 田

日本自明治維新，國勢日強，近鄰中、韓都是弱國，遂得姿意向外侵略。她的侵略口實，就是所謂人口過剩，國內無法生存，不得不別求出路。這種似是而非的謬說，不料居然會贏得若干糊塗的國際人士同情，因而更增長她向外侵略的怒焰，北至我東北、朝鮮、庫頁島，南至我台灣、南洋等地，便都成了她的侵略目標，一一被她吞食。在她的說法，以為先有了人口過剩，而後纔實行向外侵略。然事實上却是她先蓄意向外侵略，積極膨脹人口，纔有口過剩的。她所說的人口過剩，實膨脹人口當然的結果。這是我們首先要認識的。

當公元六一〇年（日本推古十八年）日本人口不過僅四百九十八萬八千餘人，當不及今日上海一市人口之多，然到一八七一年（日本明治四年）便增到三千二百八十八萬六千餘人，十年後即到一八八一年又增到三千六百三十五萬八千餘人。二二七一年間增加了七、四分之一倍，到一八九一年（明治二十四年）大約增加了八倍。上述這個數字，是根據明治年間日本農商務省顧問德人馬葉德（P. Mayer）所搜集的資料而來，雖然未必十分正確，然也可窺見她人口膨脹的梗概。自一九三〇年（日本大正十九年）日本舉行第一次國勢調查，人口為五五、九六三、〇五三人，其後每隔五年即調查一次，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第二次調查，人口為五九、七三六、八二二人，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第三次調查，人口為六四、四五〇、〇〇五人，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第四次調查，人口為六九、二五四、一四八八，一九四〇年（昭和十五年）第五次調查，人口為七三、一一四、三〇八八，一九四五年（昭和廿一年）第六次調查，人口為七三、一一四、一三六八。她的人口增加比率，大約每五年增加百分之八、二或八、五上下，對外侵略戰中除外。這是她歷年實施人口膨脹政策所收到的效果。她愈向外侵略，而人口膨脹政策便愈積極。例如這次大戰，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她本已頒布了「國民優生法」以鼓勵人民生育，但仍嫌其空洞，不見實效，因此，到了翌年一月二十二日近衛內閣又通過「人口政策確立要綱」。這個要綱的旨趣，是「以日本人之永續的增殖和實質飛躍的向上，為確保在東亞之指導力，而適合

其分配為急務。」具體言之，即擬到一九六一年的十九年後，由現在七千二百萬人（台灣人朝鮮人不在內）要增加到一萬萬人，拿這一萬萬人，一方面是用以確保共高度國防國家的兵力及勢力，一方面即用以分配到亞東各國，去實施統制。她雖對外說是人口過剩，在這裏她感到的還是人口過少罷。不僅一國的國土是有限的，地球的土地也是有限的，以有限的土地任令無限的人口增加，縱然把全地球都加以佔領，也是要鬧人口過剩的，所以，日本若不停止其人口膨脹政策，她的人口問題永遠無法得到解決。

日本投降後所喪失的領土，佔她全領土百分之四十四，這只就喪失朝鮮、台灣、南洋太。南洋代管區域而言，若再加上我東北及其它勢力範圍，恐怕要超出百分之六十以上。宣傳慣了「人口過剩」的日本人，現在日本領土縮小到這般天地，當然更要大宣傳而特宣傳日本「人口收容」問題了。她宣傳「人口過剩」或「收容」問題，最大根據是她的口密度。現在日本普通人口密度，大約每一平方公里為一百九十二人。假若照日本官方推測，日本人口到一九五〇年時，將要達到八千萬人之多，其密度應為二百零九人。二百零九人的密度，當然是極高的密度。人口高密度典型的國家為比利時與荷蘭。普通人口密度，比利時為二七一人，荷蘭為二六八人，日本為二〇九人，好幾比利時、荷蘭比日本都高。惟比利時領土面積佔百分之三十五，荷蘭佔百分之三十三，日本不過佔百分之十六。所以就耕地計算，耕地面積每一平方公里，比利時人口密度為七百六十三，荷蘭為八百零三人，日本則僅八千三百一十七人。不過，我們要明白那八千萬人的數字是虛構的，假若照實際數字，應為六千幾百萬人（參二期「創造週刊」欄「戰後日本人口問題」），應該與荷蘭人口密度相仿。而且還有日本全國人口的分佈與比利時、荷蘭不同。比利時與荷蘭人口的分佈相當平衡，而日本則多集中於太平洋沿岸幾個大都市。就一九四一年說，東京擁有七百二十五萬餘人，大阪擁有四百七十九萬餘人，只此兩都市已超過一千二百餘萬人，約佔其內地全人口六分之一。反之，北海道、東北、山陰地方人口却極稀疏，故早在明治時代，如清水市太郎、勝山孝三及德人馬葉德等便提倡向北海道移殖。現在北海道人口

密度，每平方公里僅有三十九人，故可收容三百四十多萬人。又與東北地形條件相似的，有山梨與長野兩縣，這兩縣平均人口密度為一百三十一人，現在東北人口密度為一百零八人，若把東北六縣人口平均密度增為一百三十一人，也可收容一百五十多萬人。又如把山陰人口密度一百二十一人，增高到與福井相同的人口密度一百五十九人，也可收容五十萬人。其他如南部九州、四國人口稀疏地方，當然也可用同樣方式調整。這樣調整之後，目前日本人口收容應該不成爲問題的。

筆者以爲：現代國家在未走到「天下一家」以前，每個想和平相處不存心搗亂的國家，都應該承認並實行三個立國原則：即（一）講求優生，節制產育，多產多死和長大人貼害社會，或當砲灰，不如少產，個個養得活，健康聰明，長大成人能夠對社會人羣有供獻。（二）經濟以自給自足爲原則，劃除過去帝國主義者的傳統政策——以他國做己國的原料供給地和銷售場。（三）人口要與經濟平衡發展，人口的增殖應該計算己國經濟力能否負擔。現在世界所以抗阻不安，不能全歸咎於資本主義的過時，舊有社會組織發生了破裂，而各強國間競相膨脹人口，人口泛濫於地球，食之者衆，生之者寡，也是其主要因素之一。日本這個重新崛起的新國家，盟國正應該在這

戰後日本人口問題

停戰後有逐漸增傾向的日本人口的自然增加率，到了本年，大大地超過了過去的最高紀錄即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二）的平均每千人增加一五·二人，而顯示了平均每千人增加二〇餘人的高率。過去的最高紀錄即昭和十六年的自然增加數爲一一·三萬人，可是去年却爲一五·七萬二千人，增多了四萬二千九百人；今年也會有與此相同，或較此更多的自然增加，這是一般人所預想的事。日本的總人口，過去一直以爲要突破八千萬人，至少是來年秋季的事，可是打破了一般人的這個預想，在今年六月初即已超過了八千萬人。鑒於這樣的自然增加率的高傾向，厚生省人口問題研究所便重新作將來的人口估計，而把昭和二十八年（一九五二）的總人口推算爲八、七六六萬餘人。經濟復興委員會即以此爲基礎，而在改正長期計劃。可是自然增加率的這樣顯著的增加傾向，益發加深了樹立復興計劃的困難；並且在復興計劃委員會有關方

個時候使地根據這三原則，去實現下列目標：

第一、使其毀掉固有的重工業、軍需工業，轉而去發展和平工業，尤其是農業，以增產糧食及棉毛紡織，她自己如能豐衣足食，自然可以少依賴別國的庫藏。

第二、使其厲行優生，節制產育。照日本現有的領土和經濟力，人口退回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的三千四百餘萬人的數字，最爲合理。這個數字，也還是歐洲強國的數字。

盟國對於這個問題，好像不大怎麼注意，只有盟軍總部公共衛生福利局長賴慕士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答覆日本新聞記者時，曾提到日本應節制生育。但是，日本國內因爲切膚之痛，對於這個問題却非常關心，不斷的在討論和制策，就中以研究人口問題的「人口政策委員會」的論議，最獲得社會重視。該會認爲要想使人口與經濟發展平衡，不外兩種手段：一是復興經濟，擴張人口收容力，一是人口自行調整。然鑑於經濟的基礎潰滅，難期人口收容力有多大的把握，故不如根本糾正從來的人口膨脹政策，一變爲節制生育。前述人口分布的調整，足救濟目前，節制生育乃却是一勞永逸的百年大計。

展望

日本「朝日新聞」載
李 辛 譯

面，也正在提倡着重新檢討人口問題及樹立對策的必要。最近的人口問題的概略，可概說如左。

戰後人口的激增

日本本部人口，在停戰的一年即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十月一日，爲七、二四〇萬人，但三年後的昭和二十三年十月一日，被推定爲八、〇五五萬人（據人口問題研究所最初的推定，昭和二十三年十月一日爲七、九九九萬人，昭和二十七年爲八、二九三萬人，這個數字便是五月下旬發表的長期計劃「第一次草案」所依據的基礎。）人口的增減，是從出生與死亡之差的自然增加，與由遷歸或離日等的移動而發生的。可是在三年內增加了八十餘萬人口的主要原因，第一是在足與戰前日本的最高記錄相匹敵的高出生

率，第二是在內戰後社會衛生的改善等因而激劇減低並且穩定於低水準的死亡率；這兩者間的顯著的相差，是最近日本人口發生激劇的自然增加的原因。

先就出生率說。在剛停戰時，則因戰爭末期的受胎率的低下及流產等原因而，從過去每千人中二十人左右的這一平均記錄，低落至十六至十九人這一空前未有的低率。可是從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後半期起已回復至二十人左右，昭和二十二年則更昇到了二十五人至三十人，到了今年，則已打破了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的三十二人的記錄。

再就死亡率說，在剛停戰後，達到與過去最高率即大正七年（一九一八）的每千人中二十七人這數字相近的每千人中二十五、六人。可是從昭和二十一年後半期起，即已回復戰前的平均水準，其後則又漸漸減低，最近則穩定於每千人中十人至十一人的這個數字。戰後出生率的上昇而回復戰前水準，這事據說是全世界共通的現象。可是死亡率並不隨之上升，反而低落，這原因大概在於以下各點：由於注射 DDT 和 BCG 等而招致了一般的衛生狀態的改善，又因配尼西林等新藥的普及之故，足使因傳染病而致的死亡率有相當程度的減低，此外，乳兒死亡、結核症與腦充血致死等現象，也因上述的原因而減少了。

人口自然增加率，在剛停戰後，雖曾一時減少，但從昭和二十一年起漸次增加，在昭和二十二年下半年期，則突破戰前昭和十年（一九三五）的每千人中十五人的記錄，而繼續上昇，這一年的平均增加率，達到了二十一人這個日本前所有未有的高率，即使在今年，也繼續着這個傾向。

再就因人口移動而發生的增加說，在停戰時，有六百數十萬日本人從國外被遣歸，這事對於人口總數的增加上當然佔着重要的地位，可是另一方面，被推算為六十萬人的離日，却遲遲不能實現。這樣，因人口移動而發生的增加，在昭和二十一年春季，每月為五、六十萬人，但其後則由於海外日人的遣歸工作日趨積極，其因人口移動而發生的增加速度漸漸減低，在昭和二十二年，每月不過四、五萬人，最近則更少。

一 將來人口推算

日本的人口問題研究所，曾考慮着上述的人口變動，而於最近製成了將來人口的新推算。依據這個新推算，認為在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至少將

突破九千萬人。

將來日本人口推算

年次	總人口(單位萬人)	出生(每千人中若干人)	死亡(同上)	自然增加(同上)
一九四八	八、〇五五・〇	三三・五三	一四・四四	二〇・〇九
一九五〇	八、三三七・一	三〇・八六	一四・〇五	一六・八三
一九五二	八、六四〇・三	二八・二一	一三・六二	一四・五九
一九五五	九、〇一六・九	二六・八五	一三・〇〇	一三・八三

人口問題研究所的上面的推算，是以昭和二十二年的臨時國勢調查結果總人口七、八六二萬七千人作為基準的，並且：(一)關於出生率，把昭和二十三年視為與二十二年相同，二十四年以後，則估計為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德二國出生率的一半的速度減低；(二)關於死亡率，推算昭和二十二年的死亡率一四・六五人，至昭和三十年將減低至一三人。在目前，這是將來人口推算中最確實的推算，經濟復興長期計劃，也已把第一次草案所依作根據的人口推算捨去，而改依這個新推算作為基礎，而在進行擬具計劃中。

三 人口過剩對策

在外國，早就把日本的人口問題，作為與日本的復興相關聯的問題而在議論着了。這裏試將以人口增加為出發點，而在苦心研究着經濟復興計劃的樹立的復興委員會事務局等機關的意見綜合起來，則大體如下面所述。即日本因為戰敗的緣故，喪失了殖民地與獨佔市場，食糧與工業原料的獲得漸成困難，國內資產也受了大損害，經濟的基礎已縮小了。可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日本人口，由於六百萬左右的海外日人的被遣歸，又加戰後的激劇的自然增加，這樣下去，生產力的擴張趕不上人口的增加，今後很可能達到有如史達勒博士所說的，與其他東亞諸國同樣的事態。為了擺脫這種危機，早日達到不需外國援助的那種自立經濟，並把經濟回復至戰前水準，則一方面必須實現最大限度的輸出的增加，國內資源的活用，消費的節約，外國資本的援助，一方面，在國內人口難於移殖海外的現狀之下，無論如何必須實行人口增加的抑制。否則，每人平均的實質國民所得及消費，將與人口增加不相符，而必定削減；在這種時候，即使食糧等的必要輸入量增加，也將因沒有輸入資金而不能輸入，所以必然地將成爲生活水準的降低，而出現同類相殘的時代。(譯自十一月十四日「朝日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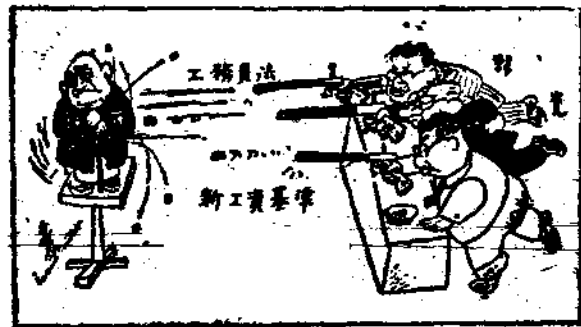
漫畫之頁



↑ ！吧費活生點一助捐請
誌雜「相眞」日



↑ ！大警是遍察警
誌雜「日朝刊週」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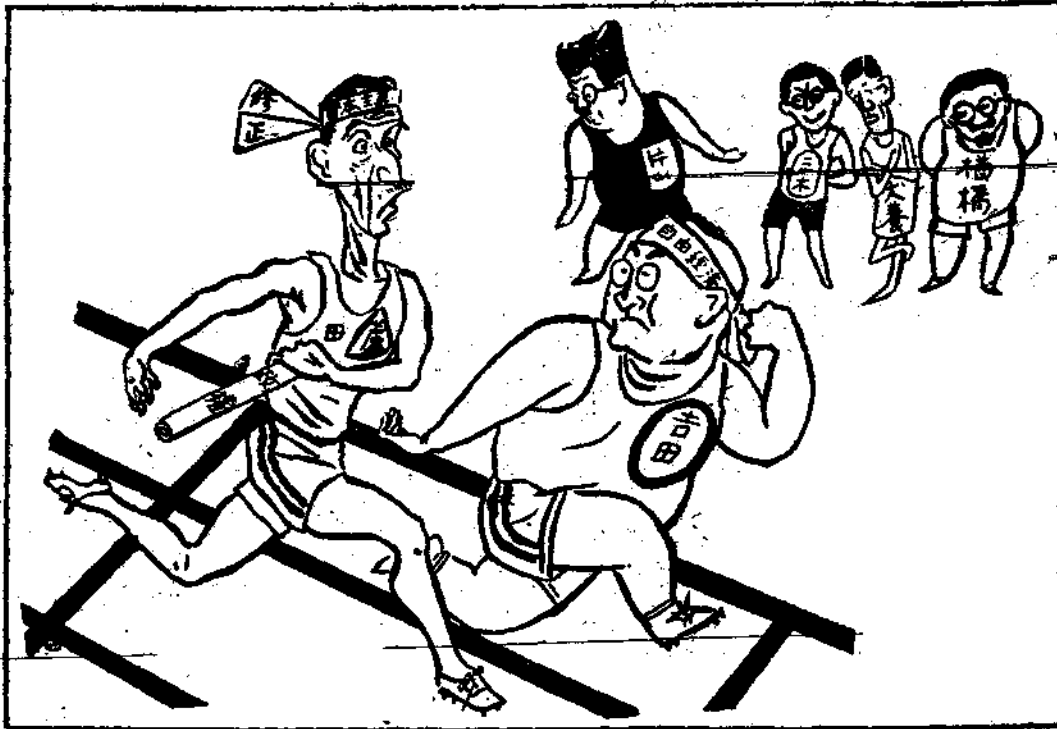


↑ ！望人的他落擊
「聞新日朝」日

↓ 作漢錦區 掉不大尾



↑ 者拜崇的族陽太新
誌雜「日朝刊週」日



日本保守陣線的接力賽跑
——無論誰走，路線總是一樣的
日本「政界吉普」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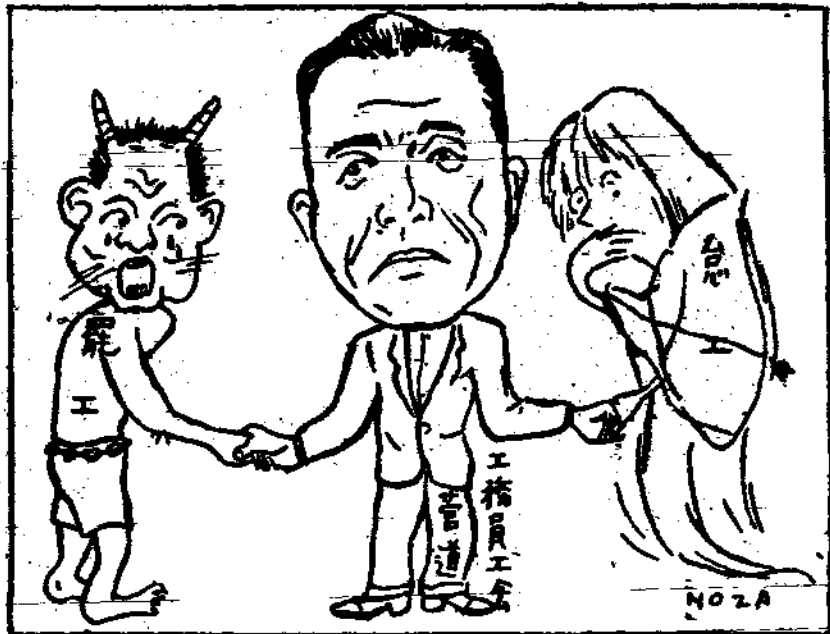
兩黨合併問題
三木：你把民主黨議員請去一點
再合併吧。——日本「週刊朝日」雜誌



不會算錯嗎？忙著計算
總選舉得票數的日本各政黨——
日「每日新聞」

→ 頒發波茨坦政府禁止公務員罷工

——日「旋風」雜誌





裕仁瑣談

卜風

隨着遠東法庭審判日本二十五名甲級戰犯的悲劇的漸漸接近尾聲，喧傳波茨坦宣言所謂「苟非將不負責任之軍國主義逐出世界，和平安全及正義之新秩序無由產生」，而熱烈期待着一「欺騙日本國民使其深犯征俄世界之舉者之權力與勢力，應永久消滅」一事的實現的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他們的視線雖然投向始終沒有在法庭受審的另「一個」幸運的人物了。這便是雖然長不滿五尺，在另一種意味上却也「心勇萬夫」的日皇裕仁。在今天，只有日本國內極少數的一部分倭倭「天皇宗」的善男信女，還因為浸漬在「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的誤實思想中而主張裕仁不應負侵

略戰責任，和同樣是極少數的一部分日本人，故意歪曲事實，說裕仁不過受了日本軍閥的欺騙與操縱而已，他本人實在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但是，有如林語堂氏早就指摘的那麼：如果說裕仁是受了騙，則天皇就並不「神聖」，若說並未受騙，就應自起對聯合國開始侵略戰的責任。由於三年來遠東法庭的審判，已完全判明裕仁事實上擁有決定戰爭與否的權力，一點也不是受騙或被操縱，所以不能當作白痴或神經病者看待，而可以不必追究他個人的責任。即使是三年來竭力為裕仁推卸戰責的季南檢察官，到今天也並不否認裕仁的責任，只好把不予起訴的原因推在「政治的理由」了。我們不大明瞭這所謂「政治的理由」，

是不是說：把裕仁作為戰爭責任者付之審判，反足使「和平安全及正義之新秩序無由產生」？或者使日本的民主化發生阻礙？我們知道的是：紐倫堡法庭條例曾明白規定國家元首也應受審；同時，我們也知道：號稱「世界最高水準的憲法寶典」的日本新憲法中曾規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

然而裕仁「神聖不可侵犯」的光輪的裕仁畢竟是「幸運者」，儘管受命於他的「忠臣義士」東條之輩可被宣告死刑，但裕仁本身却依然是國家的元首——不，應該說是國家的「象徵」。即使在將來，只要「政治的理由」還存在一天（這在某些人們看來大概是永遠存在無疑），戰犯法庭與國家「象徵」是無緣的。既如此，

還要翻出什「木戶日記」「原田日記」之類來證明裕仁是戰犯，縱不致重蹈杜重遠先生的「閒話天皇」的筆端，畢竟是說也無用的「廢話」。還不如談談裕仁的身邊瑣事，說不定能使我受過日本侵略戰的血的洗禮的中國人民，也會如金壽德次郎向日本人民說教那麼，對「日本天皇」一詞「憤恨」一番，有益於未來的「提攜」；最不清，也可作茶餘酒後的談助，總比戰犯云云的「不敬」的「廢話」較勝多多。

話說裕仁（不稱日本「天皇」而直呼其名，想其「無禮」！）生於一九〇一年，即明治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正是他的祖父明治業已戰勝中國，而積極準備擊敗北極熊帝俄的時候，當時日本人民對明治皇帝的功勳感佩，感激得五體投地，同時向大陸發展的軍國思想也正

瀾漫全國，裕仁生於此時，其軍國主義者的素質可說與生俱來，正是生得其時。八歲入「學習院」讀書，當時的院長正是被日人稱為「武聖」的乃木大將，春風化雨之功，那還用說。與大正即位同時，裕仁被立為太子，在大正三年（一九一四），裕仁已在「學習院」初等科畢業，即入「東宮御學問所」，當時該所總裁是日人稱爲「日本海軍之父」的東鄉元帥，所謂「御學問所」，其爲充御用學者與名將，其爲充分達到了「御事所」的目的——即如何做天皇，自然也不用贅說。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三月遊歐，先報聘「盟邦」英國，然後遊歷西歐，九月返國。返國後，因爲他的父親大正患病，有人說大正因爲在青年時代風流過了分，生的是梅毒，所以從即位後即一直患病，不問國事的，更依據「皇室典範」而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攝政，到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大正死去，裕仁便即位，改號昭和，這便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們所歌頌的「昭和聖代」的開始。事實上這「聖代」並非歌舞昇平，却是日本民族的苦難時代。在裕仁即位後不久，日本便因一九二九年世界大恐慌的浪潮的衝擊而陷入經濟的不景氣，其後又因一九三一年的瀋陽事變而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幕布，使日本從此陷入了泥沼。

在停戰以前，日本天皇是「雲天之上」的存在，可是說投降以後，裕仁却從神壇下降而變成「人間天皇」了。在一九四六年元旦，裕仁對日本國民頒發詔書，說明他不是「現身神」而是普通的「人」。並且爲了以事實表示天皇的「人間性」，就從那年起，常常穿了西裝代替過去的大元帥服到處「巡幸」。日本人民對裕仁的這一「人間性」的演出，有感謝得不知所云的，也有表示着極度反感的。關於前者，在保守反動的報紙上表示得最明顯。例如「每日新聞」的「一九四七年版「年鑑」中，對「人間天皇」的「巡幸」曾這樣描繪着：「從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起，積極地開始行幸地方了。可是一掃過去的形式和警備，戴着便帽，穿着西裝，頭髮不光，皮鞋不亮都

不介意，而走到民間去了。在徒步走着的時候，戴着具有威嚴的細眼，把靴背稍向前傾，浮着穩重的微笑，把抓了便帽向左右揮動着向前走去。……

一走到市政府，第一聲便問：「有沒有受傷的人？」……

……據着秋季的稻田中的種子，說「肥料不夠，一定很辛苦了」吧？大大地體念農民的苦勞。碰到小孩子，便說「幾歲了？」「可愛嗎？」摸摸他們的頭。……

……特別是關於他的生活的「觀察」，描寫得真像「逼真」，說他每天只吃一頓米飯，而且是捧着麥精在內的，又說他常常表示願意和人民同甘共苦。……

……再說他所帶的一個掛鐘，還是十幾年前的化十幾塊錢買的，常常要停或不準。總之是把他說得好像真是個「愛民如子」的皇帝。可是同樣是保守性格的報紙，却又因想竭力報復他「巡幸」時的「平民化」反而錄了馬蹄。例如去年八月「巡幸」東北時，當地的一家報紙把裕仁所住的地方用了好幾十個「而已」，竭力記載其如何「簡單樸素」。那裏面說：「天皇所住的房間，不過鋪着有老松的榻榻米……而已」

；在寢室中不過是新鋪的榻榻米，和沙發與藍藤子的茶几……而已」；樓下的餐廳不過兩個六個的屏風「而已」；浴室則不過新造了一個十二平方尺的檜木浴槽「而已」；廚房則不過新造了一座「水台」而已；便所則不過改造了一座西洋式的「而已」；其他的房間也不過新換了榻榻米「而已」。……還有許多許多「而已」。因此，有一部分日本人，就把裕仁的「巡幸」，稱為「日本皇學」而已。又有一部分人則表示正面反對這種勞民傷財的「巡幸」，例如去年八月國會議員組合國支那部即曾一致議決「空決反對因天皇行幸而強化勞動」，而向地方當局提出了抗議。可是最挖苦的諷刺還得數與日本共產黨有關的雜誌「真相」的批評。「真相」始終把「巡幸」的裕仁諷刺作「掃帚」。最初是在去年九月號的「真相」上載着一篇文字，題名為「天皇是掃帚」，文字的主要內容說：「因為天皇出巡的地方都會特別打掃得乾乾淨淨，所以天皇是掃帚。」並且在文章的中間有一張插畫，是一個穿着洋裝，

穿着帽子的女人，叫人一看便知是出巡時的裕仁，只是頭部畫的是一柄掃帚；在插畫下面註着「工作者不許吃飯！」這本當時在日本曾鬧得很大，以「擁護天皇制」為政綱的當時的自由黨員，曾對「真相」的負責人說「不敬罪」向東京檢察署起訴過。可是這番雜話直到現在還是繼續被「掃帚論」，例如本年十月號的「日本雜誌」還有一篇文章「天皇畢竟是掃帚」，那裏面說：「巡幸地打掃清潔……的都市和農村，還事在文明國家，不過是供給戈果里的「巡幸」以風刺題材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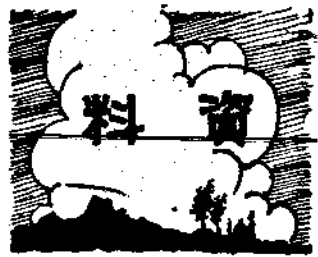
關於裕仁的「愛民」與「樸素」的材料，那是太多了。先說他的衣服吧，去年年底的外國雜誌則曾這樣說過：「天皇的衣櫃裏有六百六十六件，西裝二十三套，禮服十五套，制服二套，兜篷二件……」即使沒有把暫時退隱的「軍服」算在內，也頗不類今日鬧着饑寒貧困的「日本國民之象徵」。而且裕仁在製西裝時，據說是這樣的：裁縫代倒在隔壁房間裏，這房間由侍從官量着尺寸，如果侍從官大聲喊道「袖長五

十七英寸，於是那個裁縫便必恭必敬地說「是！」隨即記下量完尺寸，裁縫就得織成同一料子的樣子三套，由侍從官給裕仁「試穿」，如果這時裕仁略為皺一下眉，侍從官馬上說「不行」「重做」。不用說，那時即使侍從官為了想到別的事而略一皺眉，結果也同樣要被侍從官說「不行」的。至於一定要做同樣料子的三套，原因是裕仁在「巡幸」時，無論在火車中，在行轎中，時時刻刻要換穿一點，時時刻刻要換穿一點，又要叫人看了覺得是一直在穿那一套的。

再來談談裕仁的吃吧。前面提及的「每日新聞」說天皇不但在吃接着麥精的米飯，而且願意和國民一樣過食糧配給的生活。這個御用報紙的話，自然未便叫人完全置信，可是裕仁到底吃些什麼？倒也不大想像得出。這裏有一張本年六月一日的裕仁的菜單，可供解答這點的問題：早餐——麥片、牛奶、雞蛋、水果、牛奶、茶；午餐——香腸、油豆腐、捲心菜、洋蔥條、麵包、水果、牛奶、茶；晚餐——豆腐湯、米飯、鹹魚、芋艿、菠菜、醬菜

多斤的東西，才能伴隨裕仁。裕仁愛吃水果，愛吃鱈魚，愛吃龍蝦……在水果中特別愛吃香蕉。大約凡是能吃的東西他都愛吃，可是單單不愛喝酒，除了宴會以外，是一滴都不喝的。可是他的太太食子却最愛喝酒，當着裕仁面雖不喝，但每晚總得獨酌一番，不是啤酒一杯，便是日本酒一盞。

看了這國情生活活圖，裕仁一家的像書生活不難令人想起戰前英國的皇室的生活，恰巧成爲一個對照。六月間訪問日本的英人李·阿瑟氏曾這樣寫東京記者：「英國皇室，雞蛋的配給，每月每人只有一個，可是最近可以配給二個了，所以他們非常高興。」去年伊麗沙白公主結婚後，她忙忙走上密月的旅程時，並沒有忘記攜帶一件最緊要的東西，那就是食糧配給簿。並且有一次，和她接近的人問她放着什麼時候，她想了想說：「錢」因爲爸爸媽媽都爲了沒有錢而煩惱着呀！這話看來，裕仁的確是「幸運者」，英皇也應對他「憤恨」，其爲一般吃不飽穿不暖的日本人民「憤恨」的對象，固不必待金森德次郎的說教，而是太「當然」了。



戰後日本的新聞界

本刊資料室

一 新聞界民主化了嗎？

日本自投降後，由於盟總對日本言論報導自由的解放，對原有各新聞社內部的戰爭責任者的追究，以及工會的組織，在表面上，日本的新聞界是民主化了，並且有不少新興新聞出版了。盟總復於一九四五年九月發表了「給與日本的新聞紙法」，根據這個文件，日本新聞協會於一九四六年七月決定了「新聞倫理綱領」，這可視為戰後日本的新聞憲章，爲了完全實踐這憲章起見，又設置了倫理審查會，對破壞名譽，揭發私隱，作惡意評論及歪曲事實，以及色情和低級的行爲，實行新聞記者自行制裁。這樣，戰後日本新聞界在外表上是一步一步地向民主化前進，而且在逐漸顯示活潑的進展，可是其實質的內容究竟怎樣？日本長期間的封建、保守勢力的支配力量的強固，不容許日本民主化一蹴可幾，即使在平常被目爲進步的新聞，也不能例外。所以日本新聞界民主化的完成，不能不說是還很遠着。

「文化評論」第六期曾這樣說：「日本新聞所具的封建性與商業性，是戰後時起發展的？日本的新聞，在其初期，特別以忠君愛國和皇室中心主義爲標榜，以家族主義爲經營上的原則，大正以後，雖然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新聞也漸漸顯現了商業性，可是不同其爲中央

報紙或地方報紙，他們的組織即使已變成股份有限公司，但在以家族爲中心的商業主義這點上，則並無變更。在此大戰中，實行新聞的統一，採取一紙主義，即使中央的各新聞，也大多被大資本所吸納了。同時，以法律禁止新聞關係以外的外部資本的干涉。結果，便成爲大資本的勝利，封建性便益發鞏固了其基礎，免於外部資本的干涉，而更容易對軍部協力了。」

這種情形，自從投降以後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則在下面加以詳說。

二 戰後的各種傾向

現在日本新聞社的大多數，自己都沒有印刷工廠的。據去年底爲止的調查，完全有自己的工廠的新聞社，在東京祇有「朝日」、「每日」、「讀賣」三社。「東京」日本經濟「這五家。這五家除了供給自己印刷新聞紙外，還有餘裕可以供給別的新聞社印刷。在今次大戰中，喪失了很多的印刷工廠，而一方面，却又有不少的新聞紙復刊和新出版，因此，這些新出版或復刊的新聞紙大多借用上述五家新聞社的印刷工廠的一部分來印刷的。這些小新聞紙之中，其沒有白報紙的配給而僅靠黑市紙來發行的，爲數也很不少。關於這點，盟總新聞課長茵波登少校曾這樣說着：「黑市新聞的發行份數雖不多，但足以影響日本的民主化，所以應予消滅，」而希望新

聞界的協力。依據日本新聞協會去年度對三十九府縣（約爲日本全國的五分之三）的調查，可認爲黑市新聞紙的共八七三家，其中日刊五一家，隔日刊六家，週刊二三九家，旬刊二一五家，半月刊五三家，月刊一四二家，不定期刊一六六家，其發行份數，大抵爲一千份至二千份。其中專靠桃色記事以吸引讀者，或專以暴露個人的私事爲目的的變相的暴力團，或暴力團的機關新聞或雜誌，也相當多。

日本的新聞紙雖然陸續有新發行的出現，可是關於新聞紙的配給，則因爲食糧困難，通貨膨脹，石炭不足，運輸及勞力的不振與不足，而極端地受着制限。更以強把一部分新聞用紙充作印刷教科書之用，所以各新聞社爲了維持其發行份數起見，在去年三月至五月的期間，每星期只有二次出版四開報，其餘五次都是八開報紙。這種情形到了今年八月，略見緩和，各新聞紙已能每週出版二次對開報紙，其餘六次則爲四開報紙。去年度全年新聞紙配給用紙的總數爲三四五萬八千令，每月平均爲二萬八千令。其中各新聞紙的發行份數，「朝日」爲三四〇萬份，「每日」爲三一〇萬份，「讀賣」爲一六七萬份，這三家佔全部配給量的百分之六〇。從新聞用紙的配給方面看來，暫時沒有把發行份數增加的希望的大新聞，其中有很多以自己的「子公司」的形態發行新聞的。這些大新聞，可說是

形成了一種「新聞關」。不過另一方面，如「萬朝報」「時事新報」等復刊的新聞紙，以及晚報，英文報等具有特色的新聞紙，也有很多新發行的，但其編輯內容，大多像前述的黑市新聞紙那樣並不健全。至於從去年十月起，自己獲得了印刷工具而發行的日刊新聞紙「赤旗」（日共機關報），其為具有獨自的特色，是當然的，再如「東京民報」那樣，把現實的社會的事象尖銳地反映於紙面的新聞紙，雖然為數極少，但也在陸續出現着。

由大學、高等學校、專門學校的學生自治團體新發行或復刊的學生新聞，主要的為明治大學、早稻田大學、東京都立高等學校、東京女子大學、北海道大學、東京產業大學（前東京商科大學）、東京工科大学、法政大學、立教大學、日本大學、中央大學、上智大學、東京大學（前東京帝大）所發行的學生新聞；此外，得了各種地方新聞社的支助而發行的，則有以九州大學為中心的西部學生新聞、以京都大學為中心的京都學園新聞、以名古屋大學為中心的中部學生新聞等。作為這些大學的新聞研究機關，則有明治大學新聞高等研究科、東京大學文學部、慶應大學的新聞學講座、早稻田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部中設立的新聞學科等，這是仿效美國大學的新聞學科的。

三協會・記者會・特派員

日本新聞協會成立於二九四六年七月，其使命為秉承盟總的指示，處理有關編輯、用紙、廣告等各新聞社共通的問題，共同通信社代表伊藤正德當選為第一屆理事長。入會的新聞社，到一九四七年九月，共計一三八家，即：

- 日刊新聞紙 一二三家
- 通信社 四家
- 廣播電台 一家
- 週刊新聞紙 一〇家

這個協會的事業，為發行「日本新聞年鑑」，發行機關新聞紙「新聞協會報」，並發行各種資料，協助提供教科書用紙，及辦理廣告費協定等。

把各新聞社記者實行橫的聯絡的記者會，本來在內閣、內務省、外務省、大藏省、文部省、厚生省、商工省、遞信省、警視廳、東京都等機關都有設置，但自一九四六年一月起，又有新設立的關於社會黨、共產黨、各地工會、農會的報導的記者會，即「勞農記者會」，參加這個記者會的有「朝日」「每日」「讀賣」「日本經濟」「東京」「北海道」「中部日本」「中國」「民衆」「赤旗」「新新聞社」「共同」「時事」「日本勞農」「社會運動」等通信社，以及一家廣播電台。此外，「農政記者會」專以報導農林省的情形為任務，會對農相的日益陷國民於飢餓及貧窮的政策，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向農相提出決議書，促其醒悟。又在同年四月，成立了「盟軍總部記者會」。

「駐日特派員俱樂部」，於一九四七年六月改選職員，喬治・福斯脫（National Broadcasting Co.）當選為會長，張仁仲（中央社）與拉爾夫・查普曼（紐約前鋒論壇報）當選為副會長。至去年七月為止，會員共六一名。

四 各新聞社的內容及其封建性

過去在日本新聞界三三十年間平分秋色的「朝日」與「每日」的對立狀態，由於在九・一八前後

抬頭而在一九四一年銷數達到了一五九萬份的「讀賣新聞」的躍進，而成了三足鼎力的形勢。這種形勢，直到現在還存在着。在新聞事業處於高度的資本主義經濟下的今日，凡是有雄偉的社址和最新式的播音機，總之，凡是擁有大資本的新聞社，對人材也是盡量羅致着的。

「朝日新聞」以村山、上野二家的資本為背景，對社內職員採取「温情主義」，這種作風在過去的確成爲一種決定的力量，也正因此，這個新聞社被軍部及其附和者因爲「自由主義的」，而受到排斥，總之曾顯示着相當的進步性；但是究其內部，則具有封建的、保守的、官僚的空氣，也是不可否認的事。此種低迷的空氣，在戰後也還存在着，例如去年驅逐社內的左傾份子，及社內職員的退出「全日本產業別組合會議」等事，都是其證明。

「全日本產業別組合會議」，是日本工會中最左傾的工會，在他的構成份子一八個工會中的「全日本新聞通信放送勞動組合」，去年度擁有會員數達二六、五九七人，議長爲「朝日」編輯部的總編輯克巴，後來因爲發生了「朝日」員工退出「產別」的事件，他也退出了「朝日」。

「每日新聞」處處與「朝日新聞」可成爲對照，其資本系統也與「朝日」不同，情形很複雜，在創辦人本山修三死去以後，除了本山這一家以外，有王子製紙財閥及久原財閥的資本混入，因此，社內不斷地發生派閥的鬥爭。「每日新聞」的記者大都是對什麼問題都能應付一下，却不像「朝日新聞」的記者大都是專家。

「讀賣新聞」的躍進，前面也曾說及，這個新聞社的躍進爲大新聞，是正力松太郎擔任社長以後的事。在正力剛就任社長時，銷數還只有五萬份。正

力在日本社會運動史上，原是警視廳當局者之一而對社會運動竭力壓迫的人，可是這個對新聞事業保門外漢的人，自從踏進新聞界以後，關於「讀賣新聞」的種種新計劃，着着成功，終於造成了其足與「朝日」「每日」匹敵的規模。在日本投降後，正力被追放，由日本新聞記者方面資格極老的馬場恒吾担任社長。大體上就在那時起，「讀賣」的言論記載顯著地左傾，特別是從鈴木東民就任總編輯以後，這種傾向越發厲害，在社長與編輯部之間，關於編輯方針，不斷地發生着摩擦，一九四六年六月編輯部幹部鈴木等六名以及三一名職員被解職，而另聘了總編輯。這樣，社內從業人員便分成工會派和擁護社長派，抗爭至五個月之久，其間曾罷工六日，而停止印刷，但是結果，還是因社長一派對工會派的壓制，而把這次抗爭解決了。

日本新聞界空前未有的同盟罷工，其大體經過是這樣的，「讀賣」的爭端雖向勞動委員會申訴後，却沒有獲得解決。因此，「產別會議」中的「新聞通信放送勞動組合」方面，即認為有非實行同盟罷工，事件不會有解決的希望，而對各參加團體發出指令，可是東京的大新聞、地方新聞、通信社等之中，實際上參加同盟罷工的却極少，以有力的團體說，只有「放送協會」的參加，在同盟罷工的第一天，實際上停止發行新聞的只有「東京民報」一家。所以同盟罷工便成了有名無實的一幕而煙銷雲散了。再者，「北海道新聞」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在盟總新聞課長西波登少校視察北海道之際，社長曾以編輯方針過激為理由，向西波少校要求辭退五個職員，因此發生了糾紛，這糾紛直到十二月才告解決。

由於以上幾次的紛爭，各新聞社的編輯人員變

動很多，新聞的傾向也因此而有顯著的轉變，即使在大新聞中也有從此顯示右傾的傾向的，「讀賣新聞」便是一例。再者，一方面聲音白報紙缺少，所以篇幅不夠，可是一方面，試看前幾時的日本新聞紙，連日以極大篇幅，相繼刊載「帝國銀行毒殺事件」，雖然這是極引人注意的事件，但各新聞紙的盡量刊載，却並非由指摘犯行的這種正義感出發，僅僅當作偵探小說似地加以記載，目的無非在刺激讀者的好奇心。這事正證日本新聞紙仍沉迷於商業性而並不重視其文化使命。這樣看來，日本新聞紙仍在維持其封建性與商業性，距離波茨坦宣言所說的民主化的目標還很遠。

總之，對日本的新聞紙的現狀，「文化評論」第六期所說：

「第一，由於追放命令等，戰爭中的新聞社幹部是退陣了。繼起登場的，大多是他們的代理人。並且，即使應當退陣了的人，也以他人的名義，依舊深深地維持着封建關係，這是不容掩蔽的事實。第二，對新聞從業員的股票的公開，雖也實行了，但是從業員的作為股東而對新聞社經營所具的發言權還是很微弱，所以其日常的活動，依然在封建的幹部的支配下。這事所具的意義在以下二點：第一，新聞的自由、記載的自由，因着新聞企業家的利益與保守性而被歪曲，因此在新聞紙面上看不到進步、知性、文化性；第二，新聞從業員的生活，在現在的那種狀態之下，生活的合理的基礎是不能獲得的。今日的通貨膨脹，不僅使他們的生活顛沛，並且將他們驅入於飢餓。一方面，首領及其追隨者，雖愈益肥胖起來，但從業員對這事却極不自覺。最後，最可怕的事是，那種封建勢力的確固的體制，在推本中極度保存着法西斯勢力。這事在機構上是這樣情形；特別是在人事構成上，巧妙地保存自己勢力一事已成功，而且一直到今日是如此，把反對自己者，在反共的反義下予以壓服，對自己同業者，則以民主的名義，加以誣詐。這種至今還被保存着的法西斯勢力，對於生活困苦，失去自由的人們，等到一定的時機將會有什麼行動，這點，是令人想覺也覺戰慄的。」

日本主要新聞一覽

朝日新聞社	東京都千代田區有樂町二—五	長谷部 忠
工業新聞社	東京都千代田區有樂町二—一	增田 顯邦
太陽攝影新聞社	東京都千代田區有樂町每日會館	山崎啓之助
太陽時事攝影社	同前	三浦 實有
時事新報社	東京都千代田區有樂町二—四	板倉 卓造
世界日報社	東京都中央區本橋町八、內外大廈	橋田 實
東京新聞社(晚報)	東京都千代田區內幸町二—一〇	福田 英典
東京時報社	東京都千代田區日比谷市議會館	式場豐三郎
東京民報社(晚報)	東京都千代田區丸之內三—六	莊原 謙
日本經濟新聞社	東京都中央區日本橋茅場町二—一六	小汀 利得
日本時報社(英文)	東京都千代田區內幸町二—一	東崎 謙
報知新聞社	東京都中央區銀座二—三一	瀨川 廣
每日新聞社	東京都千代田區有樂町二—一	神田 正雄
讀賣新聞社	東京都千代田區有樂町二—三	馬場 恒吾

日美週刊社	東京都千代田區有樂町一—二	西村 信吉	每日新聞大阪本社	大阪府中之島三—三	木由 親男	新瀨日報社	新潟市中區一番町二二七	坂口 巖吉
日刊農村新聞社	東京都港區芝公園五—一〇	森 有義	京都新聞社	京都市中京區烏丸少將弁町	白石 古宗	北日本新聞社	富山市安住町三一	橋山 四郎
日本教育新聞社	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一橋教育會	大山 惠佐	京都日日新聞社(晚報)	京都市中京區烏丸饒頭屋町	明比 甫	合同新聞社	岡山市下之町七七	江木 健一
日本婦人新聞社	東京都板橋區小竹町二三〇五	松崎 彌造	都新聞社	京都市中京區河原町三條上	鹽貝 淳之	中國新聞社	廣島市上流川町二	村上 哲夫
文化新聞社	東京都千代田區有樂町一—四	郡山 澄雄	神戶新聞社	神戶市兵庫區渡町一丁目	田中 寬次	四國新聞社	高松市櫻町八三〇	田中幸太郎
赤旗報社(日共機關新聞)	東京都港區芝新橋七—一二	宮本 顯次	神戶夕刊新聞社(晚報)	神戶市兵庫區渡町一丁目	竹內 重一	朝日新聞西都本社	山倉市津守宮野口北	加藤 誠文
平民新聞社(日本無政府聯盟機關新聞)	東京都港區芝新橋七—一二	近藤 憲二	神奈川新聞社	橫濱市中區尾上町六—一八	佐佐木秀雄	每日新聞西都本社	門司市濱町一	加茂 勝雄
朝日新聞大阪本社	大阪府中之島三—三	小松 美幸	福島民友新聞社	福島市中區中町六〇	田子 健吉	西日本新聞社	福岡市下營保國九八四	田中 齊之
英文大阪每日新聞社(英文)	大阪府中之島二—三六	楠山義太郎	河北新報社	仙台市東三番町一七〇	菅野千代夫	夕刊福日社	福岡市天神町二八	中野 壽郎
大阪時事新報社	大阪府中之島四—一八	前田 久吉	秋田魁新報社	秋田市大町一—一四	武埜 祐吉	大分合興新聞社	大分市荷揚町二一	溝部房三郎
大阪新聞社	大阪府北區曾根崎上四—一八	全德 信治	信濃每日新聞社	長野市南區町六五七	伊藤 淑太	南日本新聞社	鹿兒島市易居町二	藤田 親義
產業經濟新聞社	大阪府北區曾根崎上四—一八	松並 勇	新東海新聞社	名古屋市中區廣小路通	白川 威海	長崎民友新聞社	長崎市出島町一〇二	田中 武平
新大阪新聞社(晚報)	大阪府西區阿波瀨通一—五	瀨戶保太郎	中部日本新聞社	名古屋市中區御幸本町通二	杉山虎之助	北海新報社	札幌市大通西三—六	阿部 謙夫

日本獨占金融資本之復興

亞東協會研究委員會

一、 侵略戰爭與金融資本
資本主義之經濟制度，於其發展之最高階段，形成以金融資本為中心之獨占組織，成為軍事侵略之帝國主義面出現者，乃一般之原則。而日本之資本主義，雖於其內部

具有封建之要素，——農業生產部門，然其發展之過程，與一般之資本主義國家，並無不同，亦係自商業資本步向金融資本之階段。結果少數之金融資本將國內之經濟政治大權，完全收納於其掌中，而成為帝國主義向外侵略之強

有力之推動力。在此意味上，戰後日本經濟之民主化，能否完成，乃繫於封建大地主所有，以及獨占金融資本之廢除，能否實現。惟其戰後迄今之過程，係在國家資本之壓巧妙之掩護下，集中力量於再建以金融資本為中心之經濟

其結果，金融資本本身，自戰敗所受之打擊中，正在急遽翻身，恢復原狀，此種事實實堪注目。

自日本明治以來之對外戰爭，無不係基於資本家、地主、軍閥、官僚等上層階級之利益而發動者，同時此與日本資本主義所有各種矛盾之發展，亦係互相照映者。只在此需注意者，即當初成爲新興勢力之資本家階級，爲內外各種情勢之壓力所抑壓，而與封建勢力妥協之結果，在表面上戰爭之主體性，並未完全採取統一之形態。惟使戰爭成爲必然之結果之客觀因素，常存在日本資本主義本身中，以此根本消滅戰爭，並非僅靠消滅一部份所謂好戰份子而可能者，殊爲顯明。

至於獨占金融資本與國家權力相結合而支配日本之政治、經濟，乃始於一九二七年之恐慌以後，自此以來銀行資本集積，三井、後與第一銀行合併成帝國銀行、三井、安田、三和、及興業等大銀行，以其自己系統之工業資本會社爲中心，迫使勢力較脆弱之財閥、中小企業趨向集中，此種傾向，曾由戰爭更急速發展。而若斯獨占資本之確立，不特阻礙以民主方式解決日本資本主義所有矛盾之途徑，反成爲準備下次戰爭之原動力。試觀直接成爲侵略戰爭之軍事費之日本國債承銷情形，當不難窺知金融資本與國家權力乃至與戰爭之關係。

日本國債承銷情形(一九四六年九月末止)

對總額之比率	
一、金融機關	
A、一般金融機關	二·四
B、特殊銀行	二九·一
普通銀行	三·六
貯蓄銀行	三五·一
銀行合計	八·七
農林中央金庫	一一·三
其他金融機關	五六·一
一般金融機關合計	三·九
B、日本銀行	六〇·〇
金融機關共計	

總計

政府	三二·八
貯蓄部	〇·八
其他	三三·六
政府合計	二·二
三、其他(法人及個人)	九五·八
共計	一〇〇·〇
未登記	

由此可知日本全部國債之六〇%，爲金融機關所掌握，再加上政府貯蓄部保有之三二·八%，總額之九三·六%，而金融機關中，銀行占三五·一%，內普通銀行占二九·一%，再其中之四三%，保屬於八大銀行，五七·七%屬於地方銀行此外農林中央金庫亦保有國債之八·七%，反之個人及一般法人之公債保有額，兩者合計不過二·二%，所占之比率實微。

其次關於對軍需生產方面之貸款，在戰爭結束當時之總額二百六十二億日元中，五大銀行及興業銀行貸出之款總額二百五十四億元，占九七%，茲將各銀行對軍需生產方面之放款，列表如下：(單位百萬日元)

銀行別	放款總額	內軍需貸款	對放款總額之比率(%)
興業	一四、六四九	九、八〇六	六七
帝國	一四、三七五	五、〇〇三	三五
任友	八、一〇九	三、三九三	四二
三井	九、二二二	三、〇四三	三三
安田	一一、〇〇〇	二、二七五	二一
三和	六、七〇〇	一、九〇三	二八

此種巨大之國債及放款，由戰爭之停止，而有不能收回之虞，故戰後金融資本所受之打擊，一時頗形深刻。又與此併行，由戰後通貨之膨脹進展，產生存款減少與放出增加之情形，致在資金關係上，發生大銀行後退，而地方銀行却代其進出之現象。茲將自戰爭結束至該年末之四個月間之五欠銀行之存款、放款、借款情況，列表於下：(單位億日元)

存款減少額	放款增加額	由日本銀行借款額
帝國	一一	一〇
三井	一八	九
住友	一三	五
安田	一〇	一
三和	一一	三
合計	六三	三〇

二、金融資本復興之過程

(一)通貨膨脹對策之實施

日本銀行券之膨脹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至該月末之間，由於戰敗後之國內不安及軍方面保有物資之一齊拋出，曾達百二十億元，其發行額在七月末爲二百八十四億元，而八月末，則達四百二十三億元，其後此種傾向，依然繼續，在其翌年之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竟已突破六百億元。以此，日本政府乃於該月十七日，實施以爲救濟置爲中心之綜合通貨膨脹對策，斷然停止向銀行行託會社存款備用等之提存，而凍結存款四百九十七億元，惟同時應當實行之檢舉控告隱匿物資之措置等，則幾無可觀者。結果，此種緊急措置，不特由防止提存而獲得資金融資本之效果。又由隨實施金融緊急措置而發行新國債之結果，曾一時大量收縮之日本銀行券，其後以一日平均四億元之比率增加。迄五月末，其發行額達三百六十三億元，是日日本政府乃於六月二十一日，實行凍結事業資金，八月十一日決定終止軍需補償，並與此相關而將業經凍結之存款，分爲第一凍結存款與第二凍結存款。大體上係以一萬五千元爲限度，超過此限度之部份，爲第二凍結存款，原則上在銀行整理完成以前，不能動用，即係欲以第三凍結存款，彌補銀行由終止軍需補償所受之損失。而銀行整理之結果，惟當資產負債多時，第二凍結存款方可轉爲第一凍結存款，至於用以作彌補損失之第二凍結存款，對於存款者，則不負償還之義務。即對於第一凍結存款，亦曾界以百億元之政府補償，以此銀行存續之基礎，可謂暫時業被保證。而由此種凍結措置，另一須注意之點：即係金融資本對於產業資本之支配力大爲變化。即由六月之凍

結果，即關於第二種結存款之凍結部份，亦喪失向金融機關借款之擔保力，今後在無其他擔保力之範圍內，已不能獲得借款。總之以「安定金融界」、「保護存款者」為口實，而實施之金融凍結，不外係犧牲存款者及產業資本，以謀復興金融資本之舉也。

(二) 財產稅之中途變質

盟軍總司令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曾命令日本政府繳納戰時稅利得稅，其目的在抑制通貨膨脹，以及明示「戰爭非致富工具」之事實。而日本政府於翌年一月方發表關於執行此項命令之方針，至其實行遲延復遲延，其間對以逃稅為目的之換取物資運動，予以充分之餘裕，而減輕當初之原意。並由該年五月美陸軍部為援助改革稅制而派來日本之勒奧察氏之報告，即原來日本政府之方案，亦被減輕分量，即原案中「法人財產稅，法人戰時利得稅，個人財產增加稅，漸被停止，僅成爲個人財產稅，而個人財產本身，在戰時中應爲法人財產之部份極大，故該年九月二十九日，提出衆議院之財產稅法案，備有其名，而完全喪失當初之本意，茲就第二次政府案與當初原案比較觀之：

- 一、第一次政府案中稅收估計額，爲財產稅七百億元（內個人財產稅五百億元，法人財產稅二百億元），個人財產增加稅二百五十億元，法人戰時利得稅五十億元，總計爲一千億元，而第二次案以徵收個人財產稅爲對象。
 - 二、起徵點，自當初之二萬元提高至十萬元。
 - 三、稅率：對超過十萬元之部份課以二五%，最高爲對超過千五百萬元之部份，適用九〇%之超過累進稅率，而當初規定之最高稅率爲一〇〇%。
- 結果，稅收額自當初之一千億元減少至四百三十五億元，而遭凍結之打擊者，並非財產，乃係中小資本及地主等。

(三) 終止凍結補償與企業整備之不徹底

日本由於戰爭之結果，其生產力急遽低下，另一方面由於漫無限制之信用膨脹，致造成龐大之虛構資本，以

爲安定其國內經濟，對於此種現象，自須加以解決。而當時之吉田內閣及金融資本家，爲避免由通貨膨脹資本，以救資本方面遭受損失，曾主張「生產之復興」及「自然增大」，出以維持資產階級通貨膨脹而增進之態度。惟其國與財產之名目上之資本總額，自一九三七年之三百億於戰爭結束當時，膨脹至五千億元。同種公債自五百億左右增至千四百億元，而其源泉僅以政府關係者，有九百億之軍需補償，二百億之債務補償，一千四百億之國公債，六十億之賠償撤去補償，三百五十億乃至有云數千億之海外財產補償等，即至少共計亦達三千六百億元或超過之。並且此種補償，無不係以一部份之戰爭協力者及附屬對象，是以日本國內輿論，猛烈攻擊政府，主張停止補償，而吉田內閣以所謂「產業界之打擊大，爲理由，加以反對。其實受打擊最大者，則爲在日本經濟上，居獨占地位之金融資本。至其後終格實行停止軍需補償者，自由於對輿論及外方之顧忌。而其隨軍需補償之停止，並實行凍結銀行存款，其理由已如前述，且同時又公佈戰時補償特別措置法，企業再建整備法，金融機關再建整備法。

至於企業再建整備法之要旨，在對凍結停止軍需補償，消除或減輕軍需會社之負債，爲此，各會社根據該法，算清特別損失，獨立整理計劃而實行之。其時銀行資本負債權者之立場，先盡量遲延其實施，以待通貨膨脹之昂進，曾主張會社資產之評價基準，採用時價評價，蓋欲藉以獲得通貨膨脹所產生之巨額評價利益，以抵銷由停止補償所受之損失。此種主張於一九四七年四月之評價基準決定上，大部業經貫徹。即既承認通貨膨脹之評價利益，並對於固定資產，亦承認其超過折舊及特殊折舊評價所生之利益。其結果由停止補償所受之損失，大部份由評價利益，在賬上已獲得填補。據該年九月十二日大藏省發表之全國七百三十九會社之特別損失核算調查，額定資本三百四十六億三千三百三十七萬七千元，實收資本二百九十億四千七百五十五萬六千元，對此須要清算之負債總額，爲五百四十五億六千一百六十七萬五千元，超過資本金之總數，而清算此種負債，先以公積金等在內積存，次以評價利

益，其中評價利益，共計爲百六十億九千五百九十八萬三千元，負債之三一%，可由評價利益填補。惟此種全體而言之計算，若以個別會社，於戰時戰後，獲得優先大股配給資料之財團會社，由計入其大之評價利益，使特別損失變爲零，已告成功，換言之戰爭中會社最優待之各會社，戰後亦由其「功勞」，而給予以周到之保護。今就事業別，以觀特別損失之清算狀況，可知特別損失之變爲零者，占如何多數。

事業別之特別損失清算狀況

事業別	特別損失%	以其資本者%	無法償還債務者%
石炭	二〇	八〇	二〇
其他	二二	四三	三五
金屬工業	二二	四三	三五
鋼鐵	二二	四三	三五
非鐵金屬	二二	四三	三五
航空機兵器	二二	四三	三五
造船	二二	四三	三五
原動機	二二	四三	三五
工作機	二二	四三	三五
電氣機械	二二	四三	三五
其他	二二	四三	三五
化學工業	二二	四三	三五
肥料	二二	四三	三五
油脂燃料	二二	四三	三五
工業藥品	二二	四三	三五
製紙纖維	二二	四三	三五
醫藥品	二二	四三	三五
橡膠	二二	四三	三五
其他	二二	四三	三五
紡織工業	二二	四三	三五
食料品工業	二二	四三	三五
雜項	二二	四三	三五

其他工業	六	六七	三三	〇
交通業	五二	一七	四〇	〇
海運	二五	九六	四〇	〇
陸運	二五	九六	四〇	〇
電力瓦斯業	一四	一〇〇	〇	〇
電力	一四	一〇〇	〇	〇
瓦斯	一四	一〇〇	〇	〇
農林業	一五	三三	四二	〇
百貨業	一五	六〇	四〇	〇
貿易	一五	六〇	四〇	〇
商事	一五	六〇	四〇	〇
商社	一五	六〇	四〇	〇
商社給統	一五	六〇	四〇	〇
制糖業	一五	六〇	四〇	〇
倉庫業	一五	六〇	四〇	〇
土木建築業	一五	六〇	四〇	〇
投資信託業	一五	六〇	四〇	〇
證券業	一五	六〇	四〇	〇
其他企業	一五	六〇	四〇	〇

種整理方法，果曾招致如何之結果？

一、弱小商工業者由負債之加重，不外破產或兼從於大資本家，而獨占金融資本由此過程，無得益趨強。

二、帳簿上，貸借相抵額，由物價隨通貨膨脹而騰貴，已轉錄至一般大帳，而大帳為低工資基準所限制，實質工資膨脹至約為一九三七年時之三分之一。

三、損失補償之一方法為斷行關閉工場與裁減工人，尤以改正施行規則（八條之二）將屬於特別整理會社，整理後之新帳中之機械施設之處分利益，亦轉入舊帳中，使評價利益填補特別損失之結果，失業者更趨增加。

三、再建整備後之金融機關

日本金融機關之再建整備，由於企業方面之整備延遲，迄一九四八年五月方完畢其最後處理。繼之完成增資等必要之手續後，已於十月一日重新開始，其間曾決定財團解體及過度經濟力集中排除法，不適用於金融機關，由此財團銀行亦僅更改其名稱而已。又除帝國銀行分為帝國（帝國三井銀行系），與第一（帝國第一銀行）兩行外，其他在戰時中統一合併者，已無重新再分割之必要，加之與企業整備之情形相同，由整備遲延，各種資材價值，由終止軍需補償，所產生之赤字，已獲填補。即從前曾發揮最高獨占力之金融資本家，依然可擁有超過戰爭而膨脹之機構，重新發足。

其次就金融機構最後處理之內容觀之：

銀行名稱	資本金	存款	新資本金	單位百萬元
(舊名)	損失率%	損失率%	(百萬元)	(舊資本金)
帝國(帝國)	一〇〇	七六	八〇〇	(〇)
第一(帝國)	一〇〇	七六	八〇〇	(〇)
三井(三井)	九三	七〇	九五〇	(九)
第一(帝國)	九三	七〇	九五〇	(九)
三井(三井)	九三	七〇	九五〇	(九)
大板(住友)	一〇〇	七〇	一、一四〇	(〇)
富士(安田)	九〇	六一	一、三五〇	(一七)
三和(三和)	九〇	六九	一、〇〇〇	(一五)
大和(野村)	九〇	六六	三〇〇	(五)

至於由以填補赤字資本金所受之損失率，較存款之損失率為大者，乃其後日本大藏省當局之方針，以「金融健全化」為第一主義之結果，恐亦可視為自銀行以吸收大眾存款為前提之觀點，而覺此為良策之結果。茲再略就各銀行於重新發足前之營業狀況觀之：

三井銀行（新名千代田銀行）傳其在財團銀行中由於不能收回對同一系統下之各會社，所優先貸出之款項，而受打擊最大，其實，該行於新舊結帳分攤後（一九四七年八月）之營業狀況，由運用自日本銀行借入之資金，已獲極度開放款業務，其本年八月末之存款額，達三百二十八億元，在大銀行中，其存款保有率占第二位。

安田銀行（新名富士銀行）其與軍需會社之關係，較其他財團銀行為薄，因之其恢復亦速，本年八月末之存款額達三百四十四億五千五百萬元，較新舊結帳未分攤時，約增加三二%，即八千四百萬元。至其在八月末為止，主要之放款對象為片倉工業四七〇百萬元，帝國纖維二五〇百萬元，日產化學六一六〇百萬元，日本冷庫一三九百萬元，日本鋼管二六六〇百萬元，日本士敏土一八四〇百萬元，大日本紡織八八〇百萬元，由此可見其對日本產業界之支配力，又其舊帳中之主要貸款對象為日本鋼管四九百萬元，片倉工業二九八〇百萬元，沖電氣二二一〇百萬元，帝國纖維一五五〇百萬元，日產化學一一一〇百萬元而皆無不能收回之虞。

三和銀行在五大銀行中，非財團銀行者，唯有三和，故其名稱亦可不變，其本年八月末止之存款額達二百七十四億七千八百萬元，其貸款對象亦如以往，以纖維為主，在其貸出額二百一十三億三千二百萬元中，纖維工業方面占三五%，機械器具方面占一五%，化學工業占一〇%，運輸方面占六%，其他如食品工業，水產業等占三四%，即其在纖維業及其他中小工業之金融方面，占有莫大之勢力，又在匯兌業務方面，與安田銀行、同居日本全國之首位。

住友銀行（新名大阪銀行）雖由終止其同一系統之軍需會社之補償，而蒙打擊，然立於戰時中，吸收之弱小銀行之地盤上，仍據主力於中小金融方面，其實力在五大銀

行中，居第二位，其於本年八月末為止之存款額，達二百五十六億七千二百萬元，其貸出額達二百零八億三千七百萬元，其對象，則有偏重工業之傾向。

野村銀行（新名大和銀行）其存款額實數雖少，然在去年中約增加五倍，傳自日本銀行借入之資金，亦已償還大部份。

帝國銀行（舊三井銀行系統）：資產總額在三月末達二百餘億元，約為實收資本之二十五倍，即在與第一銀行分離後，獨具其龐大之實力，其八月末為止之存款額三百零一億元，（三月末為二百七十億元，去年末為百八十億元）。又第一銀行在本年八月止之存款額為百六十四億元，係自帝國銀行移交而來者。

四、國家資本獨占性之強化

(一) 復興金融庫之任務

日本之國家資本與獨占資本之結合，在戰前或戰時，極其緊密，自不待言，即其兩者之關係，係通過公債投資及貸款官民合辦企業，救濟企業，參加私有之獨占企業，輸出資本而發展者，迄至戰後因其正金銀行、台灣銀行、朝鮮銀行等特殊銀行，業已解散，於是其殘存之日本銀行、興業銀行、勸業銀行等被請從動，更積極遂行其國家資本所負之任務。例如日本銀行，對有力之銀行，不斷予以低利率之貸款，以協助其恢復。興業銀行則於財團解體，企業整備上，占主動之地位，為使各種措施，有利於金融資本而奔走，並由「復興金融庫」從事一統所謂「赤字金融」之不能收回之企業貸款，又有藉此以供給政黨，以政治資本金之事實，按該金庫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以百億元之資本金，宣告成立，其本來任務，在供給各企業之設備資金，即使各企業得以其貸款，將戰時生產設備變為平時生產設備及增加新設備等，惟試觀該金庫之貸款內容，在一九四八年二月末，貸出總額八千六百五十五件，總額五百四十四億三千九百萬元，設備資金五千三百四十六件，二百三十二億二千九百萬元，佔四三%，而週轉資金二千七百九十九件，總額九千九百九十九萬元，佔五七%，脫出

以至產貸款為本來任務之範圍，而對於非生產之週轉資金之供給額，母寧為多，此種比率，其後雖曾有若干改善，然八月為止，在貸出總額八百九十二億一千四百萬元中，設備資金四百七十九億九千四百萬元（五四%），週轉資金四百一十二億二千萬元（四六%）。後者所占之比重，依然極大，加之其中未收回者達六百七十六億七千五百萬元之巨款，占總額之七六%，而問題不僅如此，即設備資金本身之內容，亦有何異。據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每日新聞暴露之事實：「用於改良或擴充新產設備者，至多不過占全額之一〇——一五%」。

其次此種貸出之資金大部份係由日本銀行券之增加發行以充之，即一九四七年中之復興金融債發行額四百零九億元中，占其七九%之三百二十三億三千萬元，由日本銀行承受。第三、在放款對象中，礦業之三七·八%（石油、炭、三·四%、公團（肥料公團、石油公團、價格調整公團、產業復興公團、肥料公團、肥料配給公團）之三〇·六%，占主要地位，其值比較多者，為化學工業、水產業、機械、金屬、電氣、交通、紡績、農林業不過〇·一%。第四、接受其貸款之會社，資本金在三百萬元以上之中小會社二千三百二十社，僅借得十七億元，其貸出總額中，以占〇·三%，反之資本金一千元以上之大會社二百六十七社，除公團貸款外，復借得二百六十八億元占八七%，試觀其巨額放款之對象，則復興金庫對大資本家之援助，殊為明顯。

會社名稱	放款額 (單位為百萬元)	會社名稱	放款額 (單位為百萬元)
三井礦山	三、〇一五	昭和電工	一、四〇一
日本鋼管	三、七二二	日本製鐵	四、一〇〇
北海道汽船	一、一六〇	日魯漁業	一、〇〇〇
日本水產	三、九〇〇	三菱礦業	一、九四五
東芝電氣	三、二二五	井華礦業	九八三
古河礦業	三、九九	南部水產	三七一
北九州石炭	五、五一	豐田汽車	二〇〇
迭賽爾汽車	一〇、九		

由上表，可知重財團等之大會社，所接受之最高額貸款，竟有達三十億元之巨額者，若以一億元作單位，則其所占比率更大。第五、為若斯龐大之復興資金，果由如何方法，加以運用之問題，此試觀君臨於復興金融庫之事務當局上之幹事會（二十六名）委員會（十二名）之構成，殊不難理解，其幹事會，係以大藏省銀行局長為議長，網羅各省之中堅官僚，委員會則由副相任會長，以經濟安定本部長官、農工農林兩大臣、日本銀行總裁、經濟團體聯合會長、農工中央金庫理事長，及其他大資本家代表構成之，三百萬元以上之貸款，須由此決定。所謂經過事務當局之申請借款，在此種實情下，不過備屬形式，而企業者方面，咸向以上之各委員，猛烈進行運動，其結果金融資本，官僚保守政黨三位一體之醜惡關係相互利用無遺，為本月初旬，蘆田內閣崩潰之因素之一「昭和電工事件」，不過係偶然暴露其一端，即為該事件之中心人物之昭和電工社長日野原節三，乃蘆田前首相之幕後人曾原通資之親戚，與蘆田及栗栖前經濟安定本部長官相謀，奪取森財團系統之該社，其後更通過此種關係，自復興金融庫及其次代理店之興業、安田兩銀行，前後三次，獲得二十六億三千八百六十三萬元之巨額借款，而其謝禮，乃以「政治獻金」及其他形式，向關係各方面實行賄賂。即其一面以抑制通貨膨脹為口實，各於提高勞動者之工資，大量增加大眾課稅，另一方面卻由實行通貨膨脹之根源之大量貸款，以掩護資本家之利益使更趨肥大，此可見戰後日本之國家權力與金融資本之結合，是如何緊密。茲再就其計劃資本之內容，以觀其最近國內資金運用之實情。

計劃資本之內容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一日)	金額
計劃資本總額	八六九億元
國家資本 (政府出資)	五二·七%
銀行資本 (勸業銀行債券)	三八·〇%
及復興金融債券	
民間資本	九·三%

上表中，國家資本與銀行資本合計達九〇·七%，此

據新對資本之大部份，由官債與特種銀行掌握之表現，對國民間企業資本佔九。三，其餘不過七十八億元。此以戰前之貨幣價值換算時，即戰前其下降率為一〇〇，亦僅七十八億元，較一九三〇年之民間資本則僅二千萬元，其低降殊甚，所謂「金融事實上現存國家之管理下」者，其理由即在於此。

(二) 金融制度改革之意義

日本在舊金融機構之基礎上，使資本以獨占資本為核心之改革，同時準備改革金融制，由此以制約金融機關之活動，而其金融制度改革之基本方針，係六種如次：(每日新聞八月二十二日)

- 一、設可稱之金融委員會(Banking Board)之新機關，以爲金融政策之最高決策機關。
- 二、改組現在之日本銀行，使成爲在金融委員會之指導監督下之中央銀行，至其業務限於發行通貨，辦理匯兌，辦理貸款等，而無他米之金融權。
- 三、關於一銀行以及各金融機關之業務運轉，本財

對日和約問題

邵毓麟 李秋生 孟憲章 方秋華 李純青 張廷銜 等著

本書內容包括中國對日和約的態度、盟國對日和約的態度、對日和約的基本問題、對日和約的領土問題、對日和約的經濟問題、對日和約的賠償問題、對日和約的政治問題、均係國內外日本問題專家所著，材料豐富，觀點正確。本書存貨無多，欲購從速。現價二十元。

控訴日本軍閥的罪惡

日·田中隆吉著 趙南柔譯

本書作者曾任日本兵務局長，爲日本投降後養成以上各書均由上海(五)環龍路一七七號亞細亞社發售

內政部雜誌登記京滬警字第一號警署登記

獨占集中支配企業，以及保證存款等，所謂民主之原則而制訂法規。

以上之改革案，不過第一原則，至其成案實施，尚需一年以上之時日(北村誠相談)以此理加檢討，自不可不將該案具有之基本方向觀之。

一、「金融委員會」之構想，相當於美國之聯邦儲備局，委員會之構想，限於關係，委員之任期務求其長。

二、「金融委員會」之構想，係將現在之金融行政官廳、大議會所有之金融行政權及日本銀行受託之委託而代行之金融權統制權，合併掌握之。其結果該委員會之地位，成爲可稱爲「金融者」之獨立行政機關，加之，其委員之任期，苦不能爲內閣之更迭所左右，則其權限，當超越政治。

總之，新改革案所置圖者，對外接近美國之金融制度，對內則向金融政策之獨立運用，此恐可稱爲對盟國所謂「戰後世界資本主義之動向，適通如以往之數個強大之金融資本國家之對立，爭霸時期，而正貼服於一巨大金融資本

對日和約問題

本書，約十萬字，分「戰爭爆發前後」、「戰爭的爆發及其後一年」、「敗因」、「去職以後」四篇，對日本軍閥之罪惡，作沉痛的控訴。本書內容精彩，譯筆流暢。現價十元

日本的錯誤

日·東久通著 潘世憲譯

本書爲東久通於昨日之演講，內容敘述日本之戰敗及其投降經過，翔實可信。東久通爲日本皇族，其人比較和平開明，對於日本民族和日本政策之抨擊，及對中國問題之認識，均值得介紹。現價八元。

日韓紀行

宋越倫著

本書作者爲日本問題專家，戰後參加記者團採訪

國「美國之指導下」之現實之擔當。又美國之金融資本，欲使將處於其指導下之資本主義國家之體制，對於金融資本成爲「安全」而有「標準」之體制，恐亦難免。

其次，構成「金融委員會」之關係，真正由民主方法選出，在現在之日本，是不可能。即若國家資本與金融資本之結合程度，在全體上，發展至國家之形態，而正成爲保守階級之有力之背景之現狀，殊不難理解，再「金融委員會」所有之權限愈廣泛，則對其官僚機構之保存程度亦愈強，並與金融資本與官僚機構巨及多年之相互關係，愈益益於日有利而傾全力以護衛。固然，此種政策可預料將有幾多曲折，即金融獨占資本體制之強化，既在金融資本及產業資本，尤以民主之兩勢力，而爲足以其致命之障礙，自必發生強烈之摩擦，而若斯之對立，其政治之分野上，產產再編成之結果，殊屬必至，同時金融資本之代價者——社會法西斯主義以抬頭之機會，可遺料。

台灣的高山族

金祖同編著

本書作者究心台灣高山族問題有年，深入當地，搜集土俗資料，并根據日方資料，詳成本書，對該族種種有扼要的說明與說明。現價八元。

亞洲世紀第一、二卷合訂本

本刊精裝合訂本，金字裝面，美觀大方，可作爲學校圖書館或私家藏書用，可作專家研究參考用，可作贈親友及紀念品用。現價第一卷四十五元，第二卷三十五元。

本刊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月售價五元

南京圖書館藏